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歐元政治與經濟辯證：

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的發展評估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2415-H-032-001

執行期間：1999 年 8 月 1 日至 2000 年 7 月 31 日

個別計畫型：計畫主持人：張維邦 教授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ABSTRACT

The Euro: Interplay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Since the first of January 1999 the Euro has become a reality. It is now a legal currency of 11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roland (ex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Denmark, Sweden and Greece) shall certainly pass through a period of uncertainty. But the path to this breakthrough in creating the Euro was in the past also full of serious obstacles. However, most of them were finally removed.

In this study, we would like to focus on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which is, in fact, conducive to the institu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The EMU's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will be assessed. How the European Chief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ereafter the European Summits)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Headquarters) had reached consensus on building-up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Euro? How they have succeeded in launching a vigorous political leadership to achieve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and consequently to push further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by creating the single currency? All these aspects constitute also the essential points of our research.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which has embodied the EMU will b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in detail. Why the United Kingdom, Denmark and Sweden have preferred opting-out solution, whereas Greece is still excluded from joining the Eurol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mmanding economic necessity (imperative) have forced the European Summits to search for their future integration.

Is the Euro a panacea or an obstacle to European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the Euro on the World economy, in particular, on its eventual role as strong currency is of vital interest for 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sts.

Keywords

Euro Euroland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Maastricht Treaty

中文摘要

歐元政治與經濟辯證： 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的發展評估

1999年1月1日歐元的登場標誌著國際政治經濟的新里程碑。歐元成了『歐洲聯盟』(法、德、義、荷、比、盧，西、葡、奧、芬蘭及愛爾蘭等)十一個會員國的法定貨幣。無疑地，目前英國、丹麥、瑞典不加入歐元區(Euroland)，而希臘暫時被排除在外，在歐元運作初期仍得面對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就如同當初要走向單一貨幣時一樣，遭遇到眾多的障礙，不過最後在各國參與貨幣整合的政治領袖共識下，還是將各種困難消除殆盡。

本研究計畫將著重政治與經濟的相互辯證。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的體制化其實就是政治暨經濟互動的結果。本計畫將評估『經濟暨貨幣同盟』對加速歐洲貨幣整合所扮演的角色。『歐洲高峰會議』(即『歐洲聯盟會員國元首暨政府首長會議』)與『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布盧塞爾『歐洲聯盟』總部)如何達成營建創造強力領導促成單一歐洲法案必要條件的共識，進而推進歐洲貨幣整合，創建歐元，也是本計畫研究的重點。

制定『經濟暨貨幣同盟』的『歐洲聯盟條約』(通稱『馬斯垂克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所經過的風風浪浪，贊成與反對簽署的背景將有系統地分析。這是政治與經濟辯證最具體的個案研究。為什麼英國、丹麥與瑞典不願加入歐元？為什麼希臘被排除？考量到政治與經濟因素，換句話說，(各會員國的)國家(政治)利益與迫切的經濟需要迫使『歐洲高峰會議』不得不思考歐洲整合的將來發展。歐元是將來歐洲發展的萬靈丹或是障礙？對國際政治經濟學者而言，歐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與衝擊，特別是歐元是否將扮演一個強勢貨幣角色的影響非常重要。

關鍵詞

歐元 歐元區 歐洲貨幣整合 經濟暨貨幣同盟 馬斯垂克條約

目 錄

前言

第一節 從『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到『歐洲聯盟』(EU)

第二節 歐洲貨幣整合的演進

- (1) 戰後國際貨幣體系的建構與崩潰
- (2) 『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
- (3) 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

第三節 歐洲國家元首暨政府首長會議與馬斯垂克條約的簽署

第四節 『經濟暨貨幣同盟』(EMU) 體制的建構

第五節 法國對歐洲貨幣整合的基本立場

- (1) 戴高樂的歐洲整合理念
- (2) François Mitterrand 與歐元的誕生

第六節 德國馬克為歐元的模式

結語

附錄一

- (1) 整合的意涵
- (2) 經濟整合的鵠的
- (3) 經濟整合的層次

附錄二

- (1) 何謂貨幣同盟 (Monetary Union)
- (2) 十九世紀貨幣同盟的經驗

附錄三

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幾個里程碑）

參考書目 References

前言*

就算國與國之間不結合成一個政治聯盟(polynomial union)，其所成立的貨幣同盟(monetary union)，只要參與國家的中央銀行能夠行使全盤的、協調的貨幣政策就行得通。

(Alfred Lansburgh¹, 1928)

探討歐洲貨幣整合或許應該從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全球經濟長期持續 (*la longue durée*) 的理論架構來分析比較切題 (Fernand Braudel, 1985)，然而，到底缺少許多實證的論據，目前恐怕僅能就有限的資訊勾勒出其有可能轉變的軌跡而已。歐洲貨幣整合到歐元的形成過程中有眾多的不確定性障礙，雖然在歐盟十一個會員國，特別是法、德兩國的強力政治運作下，克服了不少，但能探討的角度不是從技術層面切入，就是從歐洲經濟整合過程入手。事實上，以計量解析歐元，固然嚴謹，然而今後歐元的演進卻無疑地還是會深受政治、社會、甚至是文化因素的制約，因此乃將題目定為『歐元政治與經濟辯證』，以期考量歐洲人對歐元的面面觀。

本論文對政治經濟學 (George T. Crane and Abla Amawi, 1997; Robert Gilpin, 1987) 所採的含意內容較狹窄，將之界定在國家介入經濟領域內，但國家不以公權力取代市場機制的運作。換句話說，國家對於經濟不以中央集權制方式統籌進行各種資源的強制分配（計畫），市場機制的運作基本上以「自由」經濟的精神為依歸，而不是以漫無標準的「叢林式」、由大財閥或是大的企業集團以及勞工領袖的合作「配合」來宰制國民總體經濟的發展。可是本文要討論的卻不是主權國家介入經濟領域，而是超越各主權國家內部機制的制約，以『歐洲聯盟』會員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層次居間協調運作（『歐洲聯盟』每年規定至少召開兩次高峰會議以及外長、財經部長等的頻繁協商）與超國家體制（即『歐洲高峰會議』、『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等機構）相互間的互動協作來提升歐洲經濟整合的發展，特別是為了達到歐洲產業能在全球新經濟態勢下，取得競爭優勢所設計的單一貨幣的施行為本論文的主要論點²。

* 本論文研究過程中先後得到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三位碩士吳佳鈴、俞建良、林宗儒、碩士生劉璐娜及日本研究所碩士生羅國應的協助，特在此表達謝意。

¹ Alfred Lansburgh, Münzunionen, Die Bank : Monatshefte für Finanz und Bankwesen, (12) 1928, pp. 731-735. 摘自 Wim F. V. Vanhoor (1997), p.1

² 一般討論政治與經濟辯證互動時，將政治(*politics*)規範為國民國家(Nation-State)內的國家機器所涵蓋的各種機制、機構(*institutions*)之間的權力互動或爭奪，當然也包涵主權國家間相互的權力運作。

歐洲貨幣整合歷經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羅馬條約』(1957年3月25日)簽署後，開始運作時期；第二個階段是『Werner 報告』(1970年10月8日)下進行歐洲貨幣整合的主要條件(*les conditions essentielles de réalisation*)時期；第三階段為『Delors 報告』(1989年4月)確定執行貨幣整合的執行模式(*modalités d'exécution*)；第四階段是『歐洲聯盟條約』（即在1992年2月7日在荷蘭 Maastricht 市鎮簽署，1993年11月1日條約生效）；第五個階段是『阿姆斯特丹條約』(1997年10月2日在荷蘭 Amsterdam 市簽署)確定單一貨幣導入的條件。

本研究報告的第一節先介紹歐洲整合從發軔到今日的『歐洲聯盟』的演變。第二節則探討第二階段的『Werner 報告』經緯過程，第三階段的『Delors 報告』、第四階段『歐洲聯盟條約』則在本研究報告的第三節有所討論。至於第五階段『阿姆斯特丹條約』有關單一貨幣的導入條件則將在第四節提出。

二十世紀中半葉歐洲進行經濟整合的過程中，如何因應與面對紊亂的國際貨幣體系，是歐洲整合的一大課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構的布雷敦森林 (Bretton Woods) 貨幣體制在1970年代的崩盤，對歐洲經濟整合造成強大的衝擊，然而歐洲在經過1970年代與1980年代初葉的摸索，歐洲整合出現了新的生機，特別是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新任主席 Jacques Delors (1925-) 的前瞻性領導下，『歐洲經濟共同體』從「量化整合」（從原始六個到今日十五個會員國）躍進入新的場域，歐洲經濟整合有了「質的變化」，各會員國在經濟財政等的協調努力，提升了歐洲經濟實質的意義，歐洲單一市場為歐洲貨幣起了不再是理論層次的整合，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階段性的發展，終於在二十世紀末葉，完成歐元的建構。將試論歐元與美元的辯證關係作為本論文的結論。

一般歐洲人最關心的，除了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外，對於貨幣整合過程中，在提升企業競爭力方面，是否會損及歐洲各國人民五十年來所享有的社會安全、社會福祉立法的保障制度？這點無疑的還是會引起歐人市井小民惶恐疑懼，歐元的引入到底會不會衝擊他們的日常生活？可是各參與歐元的國家首腦、政要依然堅持「闖進」歐元場域，到底他們要達到何種長期的目標，就值得進一步探討此種背景下的歐洲視野、觀點、景觀 (David Smith, 1997)。所謂的 European perspective 也得稍事說明一下，歐洲觀點當然包括各會員國總統暨政府首長的「主流觀點」以及社會各階層的「心聲」，但是也不能忽視暫時不加入歐元體制的會員國，特別是英國的觀點。

1999年1月1日歐元的登場標誌著國際政治經濟的新里程碑。歐元成了『歐洲聯盟』（法、德、義、荷、比、盧，西、葡、奧、芬蘭及愛爾蘭等）十一個會員國的法定貨幣。無疑地，目前英國、丹麥、瑞典不加入歐元區 (Euroland)，而希臘暫時被排除在外，在歐元運作初期仍得面對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就如同當初要走向單一貨幣時一樣，遭遇到眾多的障礙，不過最後在各國參與貨幣整合的政治領袖共識

其實，任何主權國家內的機制、機構又涉及與各類各樣的社會團體的互動，受到壓力團體的抗爭或是無形的社會習俗制約，權力如何運作？這都是屬於政治研究的範疇。十九世紀貨幣同盟的歷史經驗與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整合對今後歐元與歐洲政治整合有些啟發，值得進一步探討，因此本論文將對十九世紀貨幣同盟的經驗做個回顧分析（附錄二），希冀能從過去的史實解析出寶貴的經驗，作為探究歐洲整合的發展趨勢。

下，還是將各種困難消除殆盡。

1999 年 1 月 1 日歐元正式誕生至今，已過一年半載的時間，但其匯率卻頻頻一直走下坡，比美元的匯價低落下降；當初歐元上市時還比美元在外匯市場上高，一歐元約等於一塊八分左右 ($1 \text{ Euro} = \$ 1.07$)，然而在 2000 年 8 月 1 日，歐元與美元比價卻只剩下 $\$ 0.9205$ ，今年 (2000) 4 月底歐元對美元的匯率竟然一度低到 $\$ 0.8888$ ，為此德國的新任聯邦銀行總裁魏爾特克 (Ernst Welteke) 甚至認為歐元會低於 0.9000 「幾乎無法想像」 («presque inimaginable»)³，整整貶值了將近 23% 左右。固然報章雜誌對歐元挫勢演變持悲觀的論調，在『歐洲聯盟』中也有少數政治人物對此有微詞，可是大致上主管歐洲貨幣整合的當局，即『歐洲中央銀行』總裁 Wim Duisenberg (荷蘭前中央銀行總裁) 及其他常務理事則對歐元還是信心十足。

弔詭的是，英國迄今與丹麥、瑞典，從歐元誕生前就以審慎的態度決定不加入歐元，希臘則因未能達到『經濟暨貨幣同盟』所規定的趨合基準條件 (Convergence criteria)⁴ 而被排除在外。所謂趨合基準即：

價格的穩定：加入歐元貨幣區的會員國的通貨膨脹率不得踰越三個最低通貨膨脹率平均值的 1.5 %；

財政（政府）支出的穩定：加入歐元貨幣區的會員國的政府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國內總生產 (GDP) 的 3 %；

外匯匯率的穩定：加入歐元貨幣區的會員國的通貨匯率在兩年內穩定在歐洲匯率機制 (ERM) 所容許的匯率波動幅度 2.25 % 內；

長期利率的穩定：加入歐元貨幣區的會員國的長期利率不得超過三個會員國利率最底平均值的 2 %；

公共債務（國債）的穩定：國家舉債最高幅度不得超過國內總生產的 60 %。
(Jean-Michel Floc'hlay, 1996, p.57)

事實上，在 1996 年加入歐元的十一個國家中，除了盧森堡外，幾乎沒有一個會員國達到上述的趨合基準 (K.B. Gaynor and Elias Karakitsos, 1997, pp.37-38)，1997 年則又加上法國及芬蘭三國達到趨合基準。接著 1998、1999 年各有意加入歐元區的十一個國家漸漸趨向達成基準的目標，希臘因為差距太大，被排除在外（參見第三節第一表及第二表）。義大利的債務累積也拉近趨合基準不小，幾年來努力縮小差距總算有了成果，因此最後通過檢驗。為了達成這些趨合基準，事實上各加入歐元的會員國都已盡了全力協調。希臘應該在 2002 年底會成為歐元貨幣區 (Euroland) 的加盟國，從今年 (2000) 年初，瑞典與丹麥兩國的聯合執政黨都傾向加入歐元區，雖然丹麥人民在今年 9 月 28 日舉行公民投票，反對加入歐元。但此一表態並無法阻止歐洲貨幣整合往前邁進的運動。

³ 巴黎『世界報』(Le Monde) 記者 Pascal Riché 於 2000 年 5 月 4 日以 「Une fois de plus, la devise a crevé hier son plancher face au dollar」 (歐元對美元匯率昨天再次爆落到最低點) 為標題，報導德國中央銀行新總裁魏爾特克的談話，他認為歐元會低於 0.9000 「幾乎無法想像」 «presque inimaginable» que l'euro passe sous la barre de 0,90 dollar. Hier, la monnaie unique est non seulement passée dessous, mais elle s'est même permis quelques incursions sous 0,89 dollar (sans aller plus bas que 0,8888!).

⁴ 『馬斯垂克條約』第 109J 條明定此一趨合基準條件 (Convergence criteria)。也有人將之譯成聚合標準。

就算是對加入歐元貨幣區最有保留或是反對歐元最力的英國，布萊爾政府也在去年底（1999）透露在下次大選（2002）年將以加入歐元與否為選戰主題，等於是一次變相的公投，如果敗選的話就由新政府處理英國被孤立的後遺症。事實上，英國加不加入歐元貨幣區都有其難題（to join or not the Euro, that is the question）。為什麼歐元幣值對美元頻頻下降，卻不影響歐洲政治人物對歐元的基本立場？綜合幾個因素，可以解明這一政治經濟的現象。

舉其牢牢三點如下：

(1) 歐元與美元或是其他通貨間的匯率波動，對歐洲經濟的變動影響無關宏旨，因為從1958年歷經共同市場的發軌，『歐洲聯盟』會員國境域內的貿易年年上升，相互間的貿易額有的高達65%以上，換言之，歐元既然成了十一國的共同通貨，其匯率的變動對相互間的經濟往來絲毫不受影響。反而其境外貿易因為歐元的貶值，對歐元區域國家而言，增加競爭力。事實上，這只是就短期而言有利。美元從1970年代迄今，三十年來，與歐洲及日本各國的貨幣貶值率相當驚人，1971年前一美元可換取360日圓，在1997年一度貶低到80日圓，今年8月1日則維持在109.40日圓，貶值率高達三倍以上，雖然如此，美元依然還是世界最主要的通貨，所以不能以目前歐元與美元的匯率變動，逕自判斷歐洲貨幣整合的成敗。實際上，歐元不可能走回頭路，貨幣整合的政治意義遠高於經濟因素的打算。歐元再解體所衍生的後遺症，絕對比貨幣整合以前各自擁有國幣更加險峻，歐洲會因此成了國際金融投機客的新樂園。

(2) 主管歐元的『歐洲中央銀行』當局以維持物價穩定為其主要的貨幣政策；從歐盟各國進行貨幣整合以來，各國的物價上漲平均壓在3%左右，可說是歐洲貨幣史上的一大奇蹟。在物價穩定及歐洲單一貨幣下，歐洲大企業可以不必考慮到各國間的匯率變動，在大的規模經濟及企業創新驅使下，提升生產促銷的競爭力。歐元區域境內兩億九千萬消費者在網路新E-Economy驅動下，價格透明度日升，歐洲經濟可望因此發展起來。雖然如此，對歐元區的通貨膨脹率，『歐洲中央銀行』主管當局仍不敢掉以輕心，2000年6月份約在2.4%，是歐元登場後的最高點，比『歐洲中央銀行』設立以來所鎖定的2%的目標還高，原因就是世界油價的上漲所致。不過比起歐洲近代經濟史的任何時期而言，現在的2.4%通貨膨脹率實在是微不足道。

(3) 實際上，歐洲的經濟確實在貨幣整合大轉變中已經取得某種程度的績效，十年來歐洲的失業率一直高居不下，平均在10%左右，如今不因企業的兼併及自動化、網路化裁員解雇而使得失業率更加惡化，實際上正好相反，歐洲各國的失業率紛紛下降。『歐洲聯盟』統計局（Eurostat）於2000年8月1日所公佈的最新數字顯示，歐元區十一國季節調整後六月份的失業率已降為9.1%，低於去年（1999）6月份的9.9%，比起美國的4%及日本的4.7%的失業率仍偏高，當然這與美、日兩國的社會福利政府支出遠比『歐洲聯盟』國家的負擔還低有關。在這十一國中，盧森堡的失業率僅2.2%，其原因一來與盧森堡的總人口原本就是歐盟諸國中最少的（不超過55萬人），二來是不少就業者與歐盟機構有關且是『歐洲聯盟』平均國民所得最高的國家。倒是南歐的西班牙失業率最高，達14.1%。

第一節 歐洲整合過程： 從『歐洲經濟共同體』到『歐洲聯盟』

反對歐洲整合的聲音各國都有，在『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⁵ 尚未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EEC)⁶ 之前，法國的戴高樂就曾強烈反對超國家體制式的經濟整合，但是 1958 年重新執政後，在第五共和建制下，以法、德為主軸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終於無礙地成長發展，迄今不變。另外，反對歐洲整合的論者，有的以布盧塞爾總部的官僚 (Eurocrats) 體系為他們批判的對象，認為這些官僚不是民選，無代表性，無權規範歐洲人的生活方式。這種見解當然不必反駁就自垮，實際上布盧塞爾總部的規模遠比法、德、英與義大利各大國的官僚規模都小，其權限 (mandate) 基本上也由歐盟十五會員國制定，更沒有所謂的介入歐洲人生活範疇之說。

要分析歐洲貨幣制度的建構前，應針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建立做個歷史回顧不可。然而從歐洲貨幣整合過程的觀點而言，1950 年至 1958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開始運作之前的『歐洲支付同盟』(European Payment Union, EPU) 也得一提。戰後 1945 至 1950 年，歐洲拜賜美國『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的援助，經建復興非常快速，歐洲各國間的經貿關係活絡，雙邊的經貿清算協定 (Bilateral Clearing Agreements) 的簽署，更有助於歐洲的復興。為了讓經貿關係更行暢通，在協調並執行『馬歇爾計畫』的機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 的倡導下，解決雙邊清算的極限難題。此外，在 1950 年成立了『歐洲支付同盟』，歐洲各國經過 1950 年代的急速發展，到 1958 年為了更快速地促進貿易，採行各國通貨自由匯兌的貨幣政策，終於『歐洲支付同盟』被『歐洲貨幣協定』所取代。

1958 年正好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發軔的第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立即產生東西雙方陣營（共產對非共產）的尖銳敵對情況，雖然沒有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整個歐洲成了東西對峙的緊張地帶，冷戰於是而成。在冷戰的國際政治經濟架構下，如何化解法、德兩國間的宿怨敵對成了考驗歐洲握有實權的政治人物的棘手難題。在整盤戰略考量下，美國向法、英戰勝國施壓，緊要西德再度整軍，以抵制俄羅斯在東歐的積極備戰。此一新局勢迫使法國外長舒曼 (Robert Schuman, 1886-1963) 接受莫內 (Jean Monnet, 1888-1979) 的倡議於 1950 年 5 月 9 日發佈倡導以法、德為主軸而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其他四國如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及荷蘭立即積極響應，啓程了歐洲整合體制化的第一建構。

英國也被邀加入，可是戰後的英國依然受到傳統歷史的制約，海島孤立自主的

⁵ 『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是以超國家體系（最高公署 High Authority）來經營管理會員國中的煤與鋼的價格、銷售、勞工與資方的協調等超越各會員國的傳統運作。

⁶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通稱『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Common Market)，就是從煤與鋼兩經濟部門擴大到各經濟部門。

心態與腹地廣大的歐洲大陸格格不入，堅定拒絕加入此一日後演變成劃時代的經濟整合運動。七年後，當『歐洲煤鋼共同體』又進一步推動『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時，英國還是依然故我，並與北歐諸小國及瑞士等籌組歐洲自由貿易協定，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唱對台戲。享有「歐洲之父」盛譽的莫內⁷當時就預言英國遲早會加入歐洲整合，只要整合有成，最講究實際的英國人絕對不會放棄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果然一進入 1960 年代，在工黨執政時期，威爾遜 (Harold Wilson, 1916-1995) 首相就開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協商，申請加入歐體，但遭法國戴高樂總統兩度的否決。最後等戴高樂過世後，1973 年英國終於成了歐體的成員迄今。

法國外長舒曼倡議成立『歐洲共同體』的翌年(1951)，歐陸六國（法、西德、義、荷、比、盧）在巴黎簽署了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條約（又稱巴黎條約，April 18, 1951），1952 年歐洲的煤與鋼，在最高總署 (*Haute autorité*) 第一任主席莫內運作下，體現了歐洲歷史上具體整合的劃時代創舉經驗。

『歐洲煤鋼共同體』的發展儘管有些技術性的難題，但基本上相當順利。有此鼓勵之後，倡議成立『歐洲農業共同體』（即通稱的『綠色共同體』），『衛生共同體』，『運輸共同體』等不一而足。倒是『歐洲防衛共同體』此一構想獲得歐洲政要的青睞，在法國第四共和總理 René Pleven (1901-1993) 主導下經過密集的協商（通稱『Pleven 計畫』），六個『歐洲煤鋼共同體』創始會員國的政府排除困難，終於完成艱鉅的條約簽署 (May 27, 1952)，從 1954 年 2 月到 4 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當時的西德）及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四國國會批准 (ratification)，但法國國會卻無法通過認可而功虧一簣 (1954)。在此一高度政治性的整合嘗試失敗後，激發莫內辭去最高總署主席的職位，創立『歐洲合眾國行動委員會』(*Comité d'action pour les Etats-Unis d'Europe*)，積極結合各國朝野（政治、勞工領袖、媒體等）菁英進行創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遊說教育工作。

既然『歐洲防衛共同體』胎死腹中，荷蘭的外長 Beyen 於 1955 年提議捨棄國防，進行歐洲經濟的整合。當時義大利的外長 Martino 附議，乃在義大利最南端的西西里島的麥西娜 (Messina) 市召開六國外長會議 (June 1-2, 1955)，決議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 (*comité d'experts*)⁸ 由比利時的外長 Paul-Henri Spaak (1899-1972) 主持。於 1957 年 2 月完成的報告書因此被命名為『Spaak 報告書』(*Le rapport Spaak*)，『歐洲經濟共同體』就是以此一報告書為基礎創建的。

1957 年 3 月 25 日在羅馬簽署創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即俗稱的『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Common Market) 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簡寫為 Euratom)。首任『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主席是德國籍愛德諾總理有關歐洲事務的顧問 Walter Hallstein

⁷ 被公認為「歐洲之父」。請參閱拙著《莫內與『舒曼計畫』》，1998。

⁸ 此一 Spaak 主持的專家委員會由六國的委員組成，其中有比利時的男爵 Le baron Snoy et d'Oppuers、德國的 Karl Friedrich Ophüls、法國的 Félix Gaillard、義大利的 Lodovico Benvenuti、盧森堡的 Lambert Schaus 以及荷蘭的 G. M. Verrijn Stuard。當然靠眾多的專家又組成各個研究委員會，其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是莫內的親信 Pierre Uri 教授，渠曾積極參與『歐洲煤鋼共同體』組織條文的草擬。

(1901-1982)，曾擔任過法蘭克福 (Frankfurt) 大學校長。第一任『歐洲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則由法國籍專家 Louis Armand 擔任。

西歐的法、德、義、比利時、荷蘭以及盧森堡等六國於戰後 1951 年開始透過『歐洲煤鋼共同體』進行經濟整合，雖然英國與瑞士等其他歐陸國家倡行『歐洲自由貿易協會』體系與之對抗，但是經由 1957 年簽署的羅馬條約，於翌年 1958 年開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EC) 成功的營運，使得以英國為主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無法與之抗衡，因此從 1960 年代始，英國很現實地不得不承認唯有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英國才有望與歐陸諸國同步發展，所以在 1961 年 8 月英國保守黨執政時期，希斯 (Edward Heath, 1916-) 領航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進行長達一年又四個月的協商，但最後卻於 1963 年 1 月遭法國第五共和總統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 的否決⁹，雖然工黨在 Harold Wilson(1916-1995)執政時期又再度於 1967 年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但戴高樂於 1969 年才辭下總統職，所以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也要到 1970 年後。1970 年保守黨又贏得政權，Heath 立即加速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協商，終於在 1972 年代表英國簽署『羅馬條約』，英國與愛爾蘭及丹麥於 1973 年 1 月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新會員國，『歐洲經濟共同體』從六個創始會員國增加到九個會員國。之後，1981 年希臘加入；而經過民主洗禮及採取經濟開放體系的西班牙與葡萄牙也相繼於 1986 年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成了第十一及十二會員國；在 1993 年 11 月 1 日『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更名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 Union européenne) 的一年餘後，即 1995 年 1 月 1 日，北歐的瑞典、芬蘭及位於中、南歐的奧地利也加入『歐洲聯盟』的行列，目前『歐洲聯盟』總共有十五個會員國。

總而言之，從降低關稅到貨幣整合，並不是純經濟利益的考量。歐洲整合是經過以下幾個步驟完成的：

經濟合作與協調：

關稅障礙的消除：有形與無形關稅障礙的削除；

財稅政策的協調：財政的失衡、稅率的高低、負債與信貸；

經濟政策的調和：經濟的成長、價格的穩定、維持高就業率；

貨幣政策的統一：利率、信用貸款、貨幣量的發行、貨幣的穩定；

貨幣匯率的固定與單一貨幣的形成。

⁹ 戴高樂之否決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學者曾有不少揣測，但一般而言，除了怕英國的加入會影響以法、德為主軸領導歐洲整合的既成事實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相信英國能獨立於美國之外。換句話說，擔心英國成了美國的木馬。英國 The Times 報於 1994 年 1 月 1 日曾報導法國控告英國曾與華府簽有「密約」(Secret agreements)。參閱：Timonthy Bainbridge with Anthony Teasdale 著的 The Penguin Companion to European Union, 1995, p.274

第二節 歐洲貨幣整合的演進

一般的報章雜誌、甚至是學術期刊，在論及歐洲整合時，常常想當然地認為，歐洲法、德、義、荷、比、盧六個創建『歐洲煤鋼共同體』，然後繼續推動『歐洲經濟共同體』到今日的『歐洲聯盟』諸國，都是考量到經濟因素會帶來繁榮才積極進行歐洲單一貨幣的整合。然實際上，從歐洲整合法、德、義、荷、比、盧六個創始國繼續進行『羅馬條約』創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協商時，就開宗明義地表態這是政治的創舉遠大於經濟利益的誘因¹⁰，其後演進到 1990 年代進行歐洲單一貨幣的協商，創立歐元，歐盟各國元首與政府領導人物的政治決議因素遠大於經濟考量¹¹。要了解歐洲貨幣整合，當然得依照歐洲整合的時序演變來解析歐元誕生的背景。茲將第二次世界戰後歐洲貨幣整合的演變時期簡短地分為三個子題討論：

(1) 戰後國際貨幣體系的建構與崩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貨幣體系建構在美國主導下的兩個基本支柱上：『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其前身即『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RBD)¹²。當時美國是個新興的超霸權，兩次世界大戰都因美國的介入而結束，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還是深受保守的外交策略（即「門羅主義」¹³）所影響。

事實上戰後世界通貨新秩序是由美元這枝獨秀所支撐的，又有源自 1944 年所建制的『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寫為 IMF) 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為 IBRD)，即今日大家所熟知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 配合美元，使之成為名符其實的國際國際通貨，為全世界各地區所接受，發揮與黃金同樣的功能，因此常被稱為美金。

¹⁰ 國家主權 (national sovereignty) 的捍衛與超國家體系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的建構從 1950 年 5 月 9 日舒曼倡議創建『歐洲煤鋼共同體』時，就很明顯地展露出經濟整合得先解決政治層面的爭議性棘手難題，否則整合無從運作。

¹¹ Petri Minkkinen 及 Heikki Patomäki 在所編輯的『「經濟暨貨幣同盟」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一書的導論也曾如此地認為：In fact, one could make the argument that EMU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s much less an economic project than a political one. (Minkkinen and Patomäki, 1997, p.7)

¹² 顧名思義，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當然是以第二次大戰後協助歐洲重建為主要任務，可是後來演變成為協助開發中國家經濟建設的融資機構。

¹³ The Monroe Doctrine 是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 (James Monroe, 1758-1831) 的國務卿，即後來繼任門羅為美國第六任總統的 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 所起稿撰寫的，1823 年門羅總統正式宣佈成為美國的外交總策略，其影響美國外交政策至為深遠。主要的目的是為防止十九世紀歐洲霸權插手美洲事務，等於向歐洲霸權宣示中、南美洲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同樣的，基本上美國也不過問歐洲或是其他區域的事務。可是到 1853 年美國開始擴大其勢力範圍，除了開始遠洋航運外，也向日本叩關，Mathew C. Perry (1794-1858) 司令的黑船艦隊君臨日本江戶，迫使德川幕府不得不放棄了兩百多年的鎖國政策，十九世紀末 (1898 年)，美國擊敗西班牙，將菲律賓納入美國的版圖。

IMF 的主要功能係以維護國際經貿關係衍生出來的國際支付能夠正常運作，也就是將其可能發生的逆差及順差變動穩定下來的國際通貨體系的重要工具。而戰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以 IMF 為主軸的金匯兌本位制度 (Gold Exchange Standard)。換句話說，IMF 主導的國際通貨體系是以美元為主的關鍵通貨 (key currency)¹⁴，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先後放棄金本位，實質上黃金與本國貨幣無任何兌換的關係，黃金跟外匯一樣，主要的是用來作為國際準備資產 (International reserve assets)。

當第二次戰後世界各國，1945 年迄 1960 年代初葉，特別是歐洲復興開發時，亟需龐大的資金購買機械等生產器材以及日常消費品，而能夠及時提供這些資源的只有美國，因此美元極為短缺，乃形成美元短缺(dollar shortage)的現象。當時美國所擁有的外匯約佔全球的一半以上，交戰國為了復興重建經濟，不僅糧食萬分不足，連基本的燃料、自然資源開採都缺少資金，交通工具（車輛、輪船及航空器材）、鐵路、公路、港灣、機場、水壩、灌溉設施等基礎建設所需的外匯甚殷，歐陸及東亞在重建中依賴美國的經援及冷戰時期的軍援，其數字相當龐大。1947 年美國的國務卿馬歇爾將軍(George Marshall, 1880-1959)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宣佈大規模經援西歐各國，即後來的馬歇爾計畫，適時的經濟援助，西歐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重建，東亞的日本亦然。然而戰後尚未脫離殖民地命運的非洲、東南亞及拉丁美洲廣大地區雖然所受的戰亂破壞稍輕，但就不能與西歐一樣享有的特別優惠。大約十年後，1950 年代後半反殖民地解放運動開始，在 1960 年代非洲、東南亞及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各地區紛紛獨立，才爭取到東西方的經濟援助。

因此戰後將近二十幾年以 IMF 為主軸的國際貨幣體系運作正常，因此在『羅馬條約』並無貨幣整合的條款，到是在 1962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在一個備忘錄提及有必要成立一個歐洲貨幣的建議。

可是到到 1960 年代末期，美國因介入越戰和西歐、日本以及其他新興工業國家急速提升國際競爭力，在國際經貿市場與美國進行投資及銷售產品的競爭的結果，使得美國在國際經貿關係失去其優越的地位，在通貨膨脹及收支失衡下，美元開始無法支撐鉅額的戰費支出，美國擁有的外匯及實際負債的落差過度龐大，終於引發國際貨幣秩序的不穩定。美國 Richard M. Nixon (1913-1994)總統最後被迫放棄 IMF 所固守的固定匯兌體系，1971 年在 IMF 主導下的國際通貨體系崩潰，而後又碰上 1973 年及 1979 年兩次國際石油價格飆漲所引發的全球性危機，在通貨膨脹及高利率的壓力下，整個國際金融體系不穩定，無法正常運作。面對此以空前的貨幣嚴峻挑戰新局勢，『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終於不得不尋找出路，如何建構一個穩定的歐洲貨幣體系，成了 EEC 迫切的議程(agenda)。『歐洲經濟共同體』經歷十年的慘澹經營，在 1968 年關稅率障礙幾乎全部消除(可是非關稅貿易障礙則要等到 1992 年底歐洲單一市場完成才算消除)，經濟實力增強，連在 1950 年代不屑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英國也不得不申請要加入，但因法國第五共和總統戴高樂將軍的兩次否決，英國才於 1973 年與丹麥及愛爾蘭同時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會員國

¹⁴ 英鎊作為國際通貨，雖然在戰後被美元所取代，但是還是不失為一重要的國際貿易清算支付的通貨，因此也算得上一個關鍵通貨。而今歐元的創立，成了美元以外的主要關鍵通貨，除了成為國際清算與支付的通貨外，更是扮演了準備通貨 (reserve currency) 的角色及干預外匯市場的重要工具。

(1973 年增加到九國)¹。1968 年國際貨幣基金針對美元的難題進行研討如何穩定國際貨幣秩序的難題，這時歐洲貨幣整合的議題也適時上了日程表。經過將近十年的摸索，『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於 1979 年登場，可是離積極運作歐洲貨幣整合，一直到歐元的創建還有一段相當長的醞釀時期。

(2) 『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

如第一節所述，『歐洲經濟共同體』自 1958 年開始運作以來，經過曲曲折折的路途；法國第五共和在總統戴高樂將軍主政時期，因農業問題糾葛難分難解，危機四伏，戴高樂因此調回法國駐布魯塞爾『歐洲經濟共同體』總部的負責人，也不派部長參與歐洲事務，整個共同體的運作幾乎停擺，最後於 1966 年達成妥協(Luxembourg Compromise)，此後『歐洲經濟共同體』碰到重要議題均採取一致決解決。1969 年海牙會議確定了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 要達成的目標。不過還是要等了將近二十幾年，才得以正式運作。

從戰後，美元這一枝獨秀一直扮演黃金替代物的角色，因此享有美金的盛譽，可是一進入 1960 代後半，美國因越戰及企業外移，本國的競爭力無法面對西德與日本的挑戰，美元幣值漸漸失去優勢。『歐洲經濟共同體』也在面對新國際嚴峻情勢下，於 1969 年 7 月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巴荷 (Raymond Barre, 1924-)² 要求六個會員國交付款項成立共同基金，於經濟困難時期可隨時提領共同基金以挹注臨時支出。事實上，巴荷計畫旨在達成六個會員國協調經濟政策（特別是有關經濟成長率以及提昇就業率、穩定價格及國際收支平衡等）的製定 (Michel Lelart, 1994, p.13)。該年(1969 年)12 月在海牙舉行的六國政府首腦高峰會議有了共識，認為貨幣同盟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長遠目標。翌年 (1970 年) 3 月在盧森堡總理威爾內爾(Pierre Werner)領導下成立研究小組，針對經濟暨貨幣結盟的可能性做廣泛的探討並提出報告。『Werner 報告』(1970 年 10 月 8 日) 出爐，定下實踐歐洲貨幣同盟的三個主要條件如下：

- a. 確保各會員國貨幣可以完全自由兌換(convertibilité totale)，並且各通貨間的匯兌不可逆轉(convertibilité irréversible des monnaies entre elles)；
- b. 資金完全自由流通，各國貨幣暨金融市場完全開放，使之趨向市場整合(intégration complète des marchés monétaires et financiers)。
- c. 消除各個通貨間匯率的落差，並將各個通貨比價（匯率）固定不變(fixation irrévocable des parités monétaires)。

此三條件如果完全達成，歐洲將有個完整的貨幣同盟，主要特徵有：將有個單

¹ 戴高樂將軍之否決英國入會的理由之一是，法國主張歐洲整合應由歐洲人自己進行，反對美國透過大西洋憲章及北大西洋公約軍事介入歐洲整合。因為英國與美國的關係特殊，戴高樂擔心英國成了美國的馬前卒，或是以木馬計打亂了法、德為主軸的歐洲整合。當然有關其他經濟議題，如農業條款，也因法國有實際的利益，所以戴高樂否決了英國的申請。這也是為什麼英、美媒體一直對戴高樂反彈的原因之一。

² 後來在 1970 年代當了法國第五共和季斯卡德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1926-) 總統任內的總理。

一的貨幣（各國的通貨將消失）；歐洲將有個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及獨一無二的歐洲中銀行（確立貨幣的超國家體制）。1971年3月『歐洲經濟共同體』通過『Werner報告』的結論，採行同意在1970年後的十年間，分成兩個階段進行會員國的經濟暨貨幣結盟計畫。同時『歐洲經濟共同體』會員國決議減低相互間對美元匯率的落差，確定了所謂的在蛇(Snake)洞內上下限游動的指標。

可是因為1971年8月15日Nixon總統片面宣佈美元放棄接受匯兌替換成黃金的承諾，同時美元大幅度貶值，等於宣告1944年在美國東北部New Hampshire州布雷敦森林(Bretton Woods)所簽署的「穩定國際貨幣新秩序協定」的崩盤。終於觸發了全球貨幣不穩定的效應，『Werner計畫』受到此一衝擊，自然無法運作，只好延後計議。『Werner報告』當時受到會員國因匯率浮動造成的危機的壓力，對歐洲貨幣整合有了『經濟學者派』(Economists)及『貨幣學者派』(Monetarists)兩派分歧的論爭。德國經濟學者大多數是屬於『經濟學者派』，一貫強調各國的經濟條件漸漸趨合後，才進行貨幣的整合。以法國為首的其他國家經濟學者則都站在『貨幣學者派』這邊，認為不必等到經濟條件都趨合後，再進行貨幣整合，而是透過貨幣整合過程協調各會員國的經濟政策。

在短短的十八個月內，世界主要國家都採取貨幣浮動匯率，任由市場供需自由調度的貨幣體制迄今。面對此一新情勢，『歐洲經濟共同體』終於1972年4月將在蛇洞內游（浮）動的計議提出台面上，並且確定上下限的浮動幅度各為2.25% (Moussis, 1997, p.84)。換句話說，會員國外匯的貶值或是升值不可超過2.25%，將此一變動的曲線描畫下來，就類如蛇的游動在一定的範圍內，故稱為the Snake in the tunnel。蛇洞內浮動匯率機制算是歐洲為了穩定匯率的一種貨幣整合嘗試。1973年成立『歐洲貨幣合作基金』(Fonds Européen de Coopération Monétaire)，旨在運作貨幣趨合的條件。

1973年2月，美元由於資金大量移入歐洲，引發大幅度的貶值。該年10月因中東危機，全球石油價格狂飆，觸發經濟不景氣，進行中的歐洲整合各會員，因無法有效面對此種危機，導致經濟暨貨幣結盟的機制無法正常運作。

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正式宣佈國際通貨不再以黃金為兌匯的標的。整整四年後，到1977年10月英籍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主席簡金斯(Roy Jenkins)又開始倡議貨幣結盟。1978年9月在阿亨(Aachen，即Aix-la-Chapelle)舉行的高峰會議時法國總統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1926-)與德國總理舒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兩人共同推動『經濟暨貨幣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以下簡稱EMU)，並提出日程表，預定於1982或是1983年完成EMU的第二階段，不顧西德中央銀行技術官僚的反對，兩位政治人物同意積極著手成立『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1979年3月會員國終於聯手透過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以下簡稱ERM)縮小會員國間匯率的浮動，以達成穩定貨幣的目的並創立了「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總而言之，『歐洲貨幣制度』(EMS)是以下三個主軸為基礎建構起來的：

1. 歐洲貨幣單位(ECU)¹：ECU 成了『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貨幣記帳單位。ECU 是種貨幣籃，以會員國的經貿實力所構成的貨幣單位，隨著時間的轉移，貨幣籃的價值及組成內涵也會更動。ECU 剛開始運作時，其值與『歐洲記帳單位』(European Unit of Account, EUA)² 相等。ECU 為『歐洲貨幣制度』匯率與干預機制的參考值，也是貸款機制運作的計算值。
2. 匯率與干預機制：1979 年 3 月終於會員國聯手透過『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簡稱 ERM)縮小會員國間匯率的浮動，以達成貨幣的穩定目的，而創立『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縮寫為 EMS)。換句話說，『歐洲貨幣制度』運作的主軸是『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此一匯率實際上固定在上下浮動 2.25%，如越過此一門檻時，則各會員的央行必須支撐或將匯率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如無法達到所懸的目標，則重新擬定新匯率。而這一機制即建基於『歐洲貨幣單位』(ECU)
3. 信用機制：即『歐洲經濟共同體』會員國相互間貸予極短期的、短期的與長期的款項。

(3) 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

1970 年代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結構性的劇變，歐洲整合碰到瓶頸，如何尋找再出發的新思惟，成了歐洲政治經濟領袖的迫切課題，歐洲單一市場的建構適時地成了歐洲整合的著力點 (rally point)。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的金本位制度的演變：為什麼無法建構成既可行又穩定的國際貨幣秩序呢？為何無法建構貨幣同盟？想結合成『歐洲合眾國』的理想主義者終無法抵制高漲的民族主義者的瘋狂氣氛，而在侵略戰爭下，不僅貨幣無法結成同盟，整個歐洲也在狂亂的飄勢中解體。

二十世紀後半葉歐洲貨幣同盟的經驗之所以異於十九世紀後半葉的貨幣整合，主要原因在於『歐洲經濟共同體』本身是經過長久的經濟協調，漸次發展出單一市場，同時在財稅上也進行協調，因此消除各會員國間的經濟與政治的差異性是達成歐洲貨幣同盟的先決條件。

歐洲整合在歐洲單一市場的動力結合下急速發展，世界經濟結構性的轉變契機，使得會員國更加認識到完成歐洲廣大的單一市場的重要性，歐洲單一市場也確

¹ European Currency Unit 的縮寫 ECU，正好是法國古幣單位 Écu 的拼法。

² 『歐洲記帳單位』(European Unit of Account)是在為了實施歐洲共同農業政策的，於 1962 年 10 月 23 日的『部長理事會』發佈的規則(Council Regulation)所制定的記帳單位，1 EUA 等於 0.88867088 公克的純金。但 1971 年歐洲共同農業政策開始採用貨幣補償額，因此不再以 EUA 為記帳單位。但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為了協助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乃於 1975 年 2 月 28 日與六十四個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諸國簽署洛美條約(Traité de Lomé)，乃採用 EUA 為一貨幣籃(Panier de monnaies)，當時的貨幣籃是由：2.828 馬克，0.0885 英鎊，1.15 法郎，109 里拉，0.286 荷蘭盾(guilder)，3.66 比利時法郎，0.14 盧森堡法郎，0.217 丹麥 crown 及 0.00759 愛爾蘭鎊組成。而後，從 1978 年 1 月 1 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預算也開始使用 EUA，因此 1979 年 EUC 發動伊始，也繼續以 EUA 為等值的貨幣籃計算。

實在 1992 年年底完成。這樣的發展標示著如何進一步協調各會員國間經濟與貨幣的政策，在這一時空背景下，『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主席，法國的前財政部長 Jacques Delors (1925-) 前瞻性的領導，營建出『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的架構，而『馬斯垂克條約』的簽署與生效，將歐洲的整合及 1970 年代沒有完成的有關貨幣整合的『Werner 計畫』，積極提升到體制化到『經濟暨貨幣同盟』的層次。

1993 年『馬斯垂克條約』有關貨幣整合的運作，標誌著劃時代的創舉。歷史上不用炮戰武器進行政治經濟整合，達到大一統的歐洲，二十世紀後半葉是個彌足珍貴的歷史經驗。從單一市場到單一貨幣，不受經濟發展程度參差不齊及語言、文化、習俗差異性的制約，歐洲兩代政治經濟菁英從對話到合作，展現了無比高智慧的 leadership。

第三節 歐洲國家元首暨政府 首長會議與馬斯垂克條約的簽署

『經濟暨貨幣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以下簡稱 EMU) 如何扮演加速歐洲貨幣整合的角色？『歐洲高峰會議』(The European Summit)，正式的名稱為『歐洲聯盟會員國元首暨政府首長會議』與『歐洲執行委員會（布魯塞爾『歐洲聯盟』總部）又如何達成營建創造強力的領導模式，進而促成『單一歐洲法』必要條件的共識，終於完成歐洲貨幣整合創建歐元的關鍵時刻。

貨幣是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而主權具有排他性，歐洲貨幣整合的過程，就是對傳統的國家主權做了部份的修正，各加入歐元區的會員國，將其管理貨幣的國家主權部份釋放出來，由超國家體制的『歐洲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共同行使貨幣主權。無疑地，各國貨幣的使用常受制於空間與經濟實力，為有效地營造歐洲經濟整合，『歐洲聯盟』體認到有必要將整合提升到貨幣層次。事實上，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法律制度的演進、科技的進展已經迫使歐洲不得不正視貨幣整合的迫切性。

歐洲貨幣的整合如上面第一、第二節所提的，歐洲各國間經過漫長的合作，不一定經常順利，間隔性的挫折退縮反而是免不了。但是戰後國與國間為了解決經濟難題，爭取更大的空間，終於不得不合作無間，共同營造部份主權的集體運作，與國家主權的行使互補互利。歐洲貨幣整合在 1980 年代末進入確定貨幣整合的執行模式(modalités d'exécution)的第三階段，也就是以『Delors 報告』(1989 年 4 月)為主軸的貨幣整合階段。

從 1985 年起由 Jacques Delors 膽任『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在這個歐洲整合再發展的關鍵時刻 Jacques Delors 展現了無比創意的領導能力，將整合推進到更高層次。首先他積極推動具有共同體條約性質的『歐洲單一法』(Acte unique européen)的通過，1986 年 1 月 27 日由十二個會員國國家元首暨政府首長簽署，1987 年 7 月 1 日生效。

為了有效地推動歐洲貨幣整合，『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於 1985 年初開始從財稅、技術及各種實質層面設計進行消除各種阻止商品、資金、人員及勞務四大流通的障礙，於 1993 年 1 月 1 日完成 1957 年 3 月 25 日所簽署的『羅馬條約』條款中所列的歐洲單一市場終極目標。

從 1987 年夏開始積極推動歐洲單一市場後，Jacques Delors 又展開另一波歐洲整合，1988 年 6 月在漢諾威(Hanover)舉行的『歐洲高峰會議』(Le sommet européen)作成決議，成立一個研究委員會(comité d'étude)由 Delors 主持，研擬達成經濟暨貨幣同盟的具體建議方案。10 個月後，於 1989 年 4 月該委員會發表了今天大家所熟知的『Delors 報告』(Le rapport Delors)。1989 年 6 月在，馬德里召開的『歐洲高峰會議』通過『Delors 報告』作為達成『經濟暨貨幣同盟』(EMU)的主要依據文獻。

事實上 1992 年 2 月 7 日在 Maastricht 簽約的『歐洲聯盟條約』及 1997 年 10 月 2 日的『Amsterdam 條約』所提及的達到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的三大階段就是以『Delors 報告』為藍本。

Delors 的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 體制的確立，是配合單一市場的運作規劃，因此從 1990 年 7 月到 1994 年定為 EMU 的第一階段 (first stage)。在這一階段期間的主要運作目標是，徹底清除任何阻礙資本（資金）流動的障礙，增進會員國間的經濟財政政策制定過程的協調，另各會員國的中央銀行間的合作協調也是重點的工作。1990 年 10 月在羅馬召開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高峰會議，除英國外，各會員國同意從 1994 年進入 EMU 第二階段。由於英國有所保留，乃將共同貨幣 (common currency) 改為單一貨幣 (single currency)：歐元於焉正式登上世界舞台。

1993 年 11 月『馬斯垂克條約』創立『歐洲聯盟』的登場，標誌著各會員國得自我約束，採取固定的匯率，以進入 1999 年的以單一貨幣為貨幣整合的終極目標。1992 年丹麥公民投票不加入『馬斯垂克條約』，但是翌年（1993 年）卻通過，然而對歐元卻與英國一樣，持保留的立場。1992 年 9 月法國公民投票以些微的票數 (51.04 %贊成，48.95 %反對) 通過『馬斯垂克條約』，卻引發一連串的外匯投機危機，英鎊與義大利的里拉都受到衝擊，兩國相繼脫離『匯率機制』(ERM)。

1993 年 1 月，『歐洲經濟共同體』開始實施單一市場，不僅資本、貨品、勞務可以自由流通，連人員也能自由進出不受限制，等於為歐洲貨幣整合跨出一大步。1993 年 7 月的金融大風暴席捲西歐，等於徹底破壞 ERM 的機制，貨幣浮動的幅度大加寬闊，高達 15%。因為有此金融大風暴，使得其他會員國更加確信單一貨幣的重要性及迫切性。1994 年 1 月，歐洲貨幣整合正式進入第二階段，創立了『歐洲貨幣機構』(EMI)。從此而後，歐洲貨幣整合順暢無阻地運作迄今。1995 年 12 月，『歐洲聯盟』通過將歐元 (Euro) 定為歐洲單一貨幣的正式名稱，取代 ECU。1998 年 5 月歐盟在布盧塞爾確定參加歐元的國家在十五個會員國中計有十一國：希臘是唯一因為不符合適合基準條件而被排除在外的國家，英國、丹麥與瑞典則保持審慎的態度，以不加入 (opting-out) 方式暫時以既有的貨幣運作。

EMU 在第三階段 (1999 年 1 月 1 日) 開始之前，『歐洲貨幣機構』(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以下簡稱 EMI) 的職責與任務將由『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以下簡稱 ECB) 所接管。英國、丹麥與瑞典不參加 ECB 的理事會，對總裁的指派等事項亦無權利發表意見，當然他們也不在 ECB 的管轄範圍之內。

1999 年 1 月 1 日 EMU 進入第三階段，歐元正式登場，與本國貨幣保持固定的匯率，因此歐洲加入歐元的國家其物品將有兩種標價。銀行及外匯市場將開始使用歐元。『歐洲中央銀行』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運作，絲毫不受任何會員國政府的干涉。2002 年 1 月歐元取代加入歐元區的會員國的本國貨幣，該年 7 月本國貨幣消失，完全被歐元取而代之。換句話說，EMU 完成使命，歐元成了十一國的單一貨幣。

第一表 加入歐元十一國於 1997 年的趨合基準條件實況

	公共財政收支 (GDP 比率, %)	公共債務累積 (GDP 比率, %)	通貨膨脹率 (年平均率, %)	長期利率 (%)
趨合基準	- 3.0	60.0	2.7	7.8
德國	- 2.7	61.3	1.4	5.6
奧地利	- 2.5	66.1	1.1	5.6
比利時	- 2.1	122.2	1.4	5.7
西班牙	- 2.6	68.8	1.8	6.3
芬蘭	- 0.9	55.8	1.3	5.9
法國	- 3.0	58.0	1.2	5.5
愛爾蘭	0.9	66.3	1.2	6.2
義大利	- 2.7	121.6	1.8	6.7
盧森堡	1.7	6.7	1.4	5.6
荷蘭	- 1.4	72.1	1.8	5.5
葡萄牙	- 2.5	62.0	1.8	6.2

資料來源：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 - 表示赤字

『馬斯垂克條約』第 109J 條明定此一趨合基準條件(Convergence criteria)。

在 1997 年僅有盧森堡、芬蘭及法國三國符合『馬斯垂克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¹⁹ 在第三階段所設定的嚴格趨合規範(European Commission, 1998, p. 41)，所以政治的考量具有某些程度的影響，尤其是有關政府負債與赤字規範(deficit criteria)的主觀判斷範圍。1998 年 5 月確定通過趨合基準並有意願加入歐元區(Euroland)的國家共有十一個會員國²⁰：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芬蘭、愛爾蘭。

第二表 歐洲聯盟十五國的趨合基準條件及經濟成長率 (1998-1999)

	財 政 收 支 (GDP 比, %)		公共債務累積 (GDP 比, %)		通貨膨脹率 (年均率, %)		失業率 (年, %)		經濟成長率 (年, %)	
	1998	1999	1998	1999			1998	1999	1998	1999
歐盟	- 1.9	- 1.6	70.5	68.9	1.9	2.0	10.2	9.8	2.8	3.0
比利時	- 1.7	- 1.4	118.1	114.2	1.3	1.5	8.5	7.7	2.8	3.0

¹⁹ 『馬斯垂克條約』於 1993 年 11 月起生效，其實條約的本名是『歐洲聯盟』條約(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於 1992 年 2 月 7 日因在荷蘭的馬斯垂克鎮簽署，故名之為『馬斯垂克條約』。

²⁰ 希臘沒過趨合基準這一關卡，英國、丹麥與瑞典則不願加入。

丹麥	1.1	1.7	59.5	55.3	2.1	2.2	5.4	5.1	2.7	2.8
德國	- 2.5	- 2.2	61.2	60.7	1.7	1.9	9.8	9.4	2.6	2.9
希臘	- 2.2	- 2.0	107.7	104.5	4.5	3.6	9.2	8.7	3.8	4.0
西班牙	- 2.2	- 1.9	67.4	65.8	2.2	2.2	19.7	18.5	3.6	3.7
法國	- 2.9	- 2.6	58.1	58.2	1.0	1.6	11.9	11.6	3.0	3.1
愛爾蘭	1.1	1.9	59.5	52.6	3.3	3.5	8.4	6.5	8.7	8.8
義大利	- 2.5	- 2.0	118.1	114.3	2.1	2.0	12.0	11.8	2.4	3.0
盧森堡	1.0	0.6	7.1	7.6	1.6	1.7	3.9	3.9	4.4	4.7
荷蘭	- 1.6	- 1.2	70.0	67.7	2.3	2.5	4.4	3.8	3.7	3.2
奧地利	- 2.3	- 2.2	64.7	63.6	1.5	1.7	4.2	4.2	2.8	3.1
葡萄牙	- 2.2	- 1.9	60.0	58.0	2.2	2.3	6.2	5.6	4.0	3.8
芬蘭	0.3	0.6	53.6	52.3	2.0	2.0	12.3	11.6	4.6	3.6
瑞典	0.5	0.9	74.1	70.0	1.5	2.0	9.1	8.7	2.6	2.8
英國	- 0.6	- 0.3	52.3	50.9	2.3	2.1	6.5	6.3	1.9	2.2

資料來源：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 - 表示赤字

歐洲貨幣的統一象徵經濟整合的完成，然而貨幣的整合也是歐洲政治整合的里程碑，是政治整合的意願促成貨幣的整合，而貨幣的整合卻又將歐洲政治整合運動帶入更高難度的境界。目前的歐洲正面臨此一政治整合意願的挑戰。

歐洲自從德國統一後經歷了高失業率的煎熬，1996 年到 1997 年春失業率依然高達 12 %以上，20 歲就業年齡的無業人數百分比更是令人浩歎（20 到 30 不等），所幸從 1999 年歐元誕生後，失業率開始下降到 9.4 %。

貨幣統一的好處理論上勿庸置疑，然而政治意願以支援單一貨幣的形成則有賴歐洲一般市民對貨幣整合的認同，因此單一貨幣的形成非得一般市民的接受不可。歐洲政要，尤其是法國總統 François Mitterand (1916-1996) 及其繼任者 Jacques Chirac (1932-)、德國總理 Helmut Kohl(1930-) 等的強有力的共識，終於造就歐洲貨幣整合突破性的發展。歐洲主要國家的市民雖然一直猶豫不決，擔心各自的國家利益及文化認同的危機，但是在 1997 至 1998 年關鍵性的年代，法、德兩國人民還是接受他們政治領袖的領導，接受歐洲貨幣整合的劃時代創舉。一般歐洲人民面對日常生活的困頓壓力，對於理論上的、甚至是短期內會帶來莫大的好處，常無信心，所以『歐洲聯盟』機構與各國政府的責任愈加重大，如何開導市民，提供資訊，甚至透過教育機構（歐洲各大學經由 Action Jean Monnet 及 Jean Monnet Project 廣泛宣揚歐洲整合的重要性）及媒體進行推廣歐洲貨幣整合必要性的說帖。

第四節 『經濟暨貨幣同盟』的建構

本研究著重政治與經濟的相互辯證。EMU 的建構其實就是政治暨經濟互動的結果。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英國傳統上對歐洲超國家體系及社會福利政策、社會主義傾向的歐洲整合一直懷有戒心外，美國的經濟學者也從貨幣理論，特別是最適貨幣區域的觀點批評歐洲貨幣整合的不是。其中反對最厲害的是頂著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的佛立曼 (Milton Friedman) 及在華府有一定影響力的哈佛大學經濟學者費爾思坦 (Martin Feldstein)。

Friedman 在 1996 年接受巴黎「地緣政治學」季刊 (*Géopolitique*) 訪問時，編者以「自殺性的執迷不悟」為標題，獨家專訪 Milton Friedman (*Un entêtement suicidaire. Entretien exclusif avec Milton Friedman*)，刊出有關他對當時歐洲正積極推動貨幣整合的嚴厲評論 (Friedman, 1996)，然而卻絲毫也動搖不了歐洲政治人物完成單一貨幣的決心，到底歐洲進行貨幣整合有其深層的政治意涵，Friedman 却以單一思考面向切入 (one dimensional approach) 純理論的辯解，事實上，歐洲專研歐洲貨幣整合的經濟學者對單一貨幣的理論探討評估也常得到不確定的結論。

Friedman 以慣用的經濟原理 (*rationale*) 對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進行單一貨幣提出質疑，甚至認為進行的結果將是集體性的自殺 (*collective suicide*)。原來 Friedman 的論點建基於他的直覺觀察：歐洲貨幣整合不可能成功，因為加入單一貨幣的國家差異甚大；在單一貨幣運作下，萬一某國的景氣不振，就無法採用傳統的貶值貨幣政策，以達到刺激產業的目的。何況他認為『歐洲聯盟』各國缺乏政治魄力可以接受『歐洲中央銀行』超國家體系的自主運作，缺乏勞動人口、資金及貨物產品的可自由流通性。他還認為法國的雙數字的高失業率（一度高達 13%）無法面對 EMU 所確定的趨合基準條件，怪的是，Friedman 却懶得提及德國的失業率也超過 10% 以上，至於義大利，特別是西班牙的超高失業率，美國學者都「顧而不視」！四年來，特別是 1999 年歐元誕生後迄今 (2000 年) 業已事實推翻了 Friedman 的「警言惕語」，那只不過是「聳人聽聞」而已。Friedman 之所以無法掌握住歐洲整合的脈絡，或許因為他是理論家，同時也是美國人²¹（下意識以美元為世界唯一的通貨，其他冀想建構新的世界性通貨企圖都不足取），所以無法正確的認知歐洲政治人物的宏圖雄願新走向。隨著單一市場的施行，歐洲各國的貨物產品都能暢行無

²¹ 從 1980 年代起，美國學者擔心美國霸權走下坡，目擊三十年來歐洲整合的再復興，怎不會讓 Friedman 憂心如焚，就像 Samuel Huntington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的論調一樣，等於變相地呼籲歐洲人，應該像第二次世界戰後一二十年緊緊跟在美利堅後頭挺進！實際上，歐元短期內固然不可能與美元在世界外匯市場上相較量，但對外匯存底的分配，也起影響，至少有些新興國家會考慮到貨幣的安全性，將外匯分散到其他較穩定的通貨上。中國，東南亞、台灣及日本的外匯存底相信會增加歐元的比例，甚至外債也將會增加歐元的份量，如此當然會衝擊到美元的國際地位。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 1996) 曾以 Euro Threatens Dollar's Clout. European Central Banks Could Sell Reserves 為標題，並有如次的報導：A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is likely to cause a multibillion dollar adjustment in global central bank reserves, presenting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the dollar's dominance as a benchmark currency since World War II, bankers and officials say.

阻，現在拜賜歐元，物價透明化，歐洲消費者省了匯率手續費及價格換算的麻煩，透過 E-economy 的盛行，Friedman 的「警言」成了過慮。另外，Friedman 低估了歐洲政治人物的智慧，其實從 1980 年代後半葉起，法國主管貨幣當局在 François Mitterrand 的配合下，採取與『德國中央銀行』(Bundesbank) 同樣的貨幣政策，Friedman 應該不能對歐洲政治人物有偏見。十七個月來，沒有任何一位歐洲政治人物介入²²，企圖影響 Wim Duisenberg 『歐洲中央銀行』總裁及其他理事的貨幣政策。至於勞動人口的移動，那除了語言差異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受到歷史文化的制約，不是兩三代數十年可以變更的。然而，新一代的歐洲 E-economy 族與年輕的美國人一樣，在高科技的吸引下，也能東征西討，南北走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60 年代南歐的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當時依舊被認為是「外勞」（大部份是勞力密集產業勞動者）居多的國家，還不是照樣移轉到北歐或是瑞士。而今，歐洲勞工人口的流動，雖然不像美國與加拿大那樣暢通，卻也不是 Friedman 所指的那麼僵硬。

有關『歐洲聯盟』加入歐元區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也阻礙不了歐洲貨幣整合的運作，實際上，歐洲單一貨幣建構的另一個理由，就是要解決結構性的，無法與美、日企業在全球競爭的企業規模難題。上面所舉的統計數字表，也可證明，失業率確實下降中，就算失業率無法一下子壓在美、日的失業水平，也不能證明歐元會阻礙歐洲經濟的發展。

Feldstein 反對歐洲貨幣整合的經濟觀，主要的論據有三：(1) 『歐洲聯盟』不是最適貨幣區 (optimal currency area)；(2) 歐元將是個非常不確定、潛在性非常不穩定的通貨 (a very uncertain and potentially unstable currency)；(3) 『經濟暨貨幣同盟』極可能降低『歐洲聯盟』內各國之間的貿易範圍及緊密關係 (Feldstein, 1992)。從經濟觀點（即純技術或是理論層面）考察『歐洲聯盟』是否為最適貨幣區，固然是學術上的論述，可是如由歐洲已完成歐洲單一市場的歷史任務來分析歐洲整合，如何增加歐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怎樣降低貿易及外匯變動的風險，絕對不是抽象地純經濟理論能夠提供明確的數據，本身的數據非常不確定；維持歐洲整合現狀，及維持各自擁有的國幣，也無法證明『歐洲聯盟』諸國的匯率穩定。從 1958 年歐洲共同市場發軔以來，歐洲各會員國間相互往來的貿易額持續增加，而今除了匯率風險消除外，節省了外匯成本，難道『歐洲聯盟』會因歐元的存在而縮小貿易範圍及貿易國間的經貿緊密關係，這不但違反常識，也無法提供分析的論據以證明相反的理由。

『歐洲聯盟』諸會員國對 EMU 的支持度不盡相同，英國、瑞典及丹麥由於國內政治情勢，不容執政黨明確表態贊成進行單一貨幣協商，其中特別是英國保守黨一直對歐陸的社會民主的經濟社會政策傳統有戒心，也無法忍受強調超國家體系或是聯邦主義的傾向，幾乎本能地敵視 EMU 的創制。北歐丹麥與瑞典兩小國之對 EMU 有所保留的理由，則因國內的勞工及弱勢壓力團體擔心單一貨幣的導入可能

²² 唯一的例外是，前德國的內閣部長 Oskar Lafontaine 與德國總理 Gerhard Schröder 政經理念不合掛冠求去。Lafontaine 曾對全球化影響到社會福利政策有所批判，但並不是因為直接針對『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有所指責，而被迫辭職。迄今，對 Lafontaine 為什麼辭職，因他堅不表明，還讓人一頭霧水。

犧牲北歐進步的社會福利，自由經濟體制，特別是透過『歐洲中央銀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會對政府的財政措施（趨合基準條件中對國債及政府赤字財政的規定嚴謹）有所影響，因此謹慎評估政治情勢的演進，到 2002 年歐元紙幣、鑄幣正式流通前再做最後的決定。事實上，『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既然以維護貨幣的穩定，壓抑物價上漲為其主要的貨幣政策理念，等於自各國民國家 (Nation-State)「篡取」了部份財經社會的主權，使得北歐諸高度社會福利國家恐怕無法長久維持社會進步的財經政策，甚至有被其他社會福利政策較落後國家壓下來的可能，丹麥及瑞典的勞工暨弱勢社會團體擔心加入歐元後會觸發「社會暨財政傾銷」(social and fiscal dumping) 的效應！(Leader and Gizzini, 1996)。

然而如果從英國的角度來分析的話，從歐洲單一市場到建構單一貨幣的過程，很明顯的歐洲超國家體系架構於焉完成，歐洲今後的走向很讓傳統保守的英倫人士擔憂，他們認為歐洲會愈來愈邁向政治及社會的整合，因此歐洲貨幣整合走向各國解讀不一致，但可以確定的是，歐元的誕生與運作將改變歐洲人各自為政的心態，歐洲貨幣整合不僅具有政治整合的象徵意涵，其實也是極富有歐洲舊大陸與北美新大陸爭世界舞台的現實意義。

歐洲大陸，尤其是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執政的北歐國家，傳統上透過國家財經策略，對維護一般中產階級市民的社會福利政策不與餘力，弔詭的是，歐洲整合，特別是 EMU，相反的反而是以捍衛跨國運作的資金流動及產業投資為主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

總而言之，當前的歐洲整合實況可以說是，國民國家 (Nation-State) 主權維護中產階級市民的社會福利為依歸與歐洲超國家體系的貨幣財經政策捍衛資本自由流動為主軸，兩者之間正相互辯證中，以穩定物價、反通貨膨脹為貨幣財經策略的歐元為主要架構的『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MU 第三階段確立了其獨立於歐盟諸國的自主性而言，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介入經濟領域的傳統漸漸失去其主導的動力。今後歐洲中產階級如何保有其傳統的既得權益，以抗爭 EMU 超國家體系的運作，將是研究歐洲整合學者關注的焦點。

無疑的，以今年 (2000) 年春天丹麥及瑞典政府大致上傾向加入歐元來考察，國民國家業已表白，願以 EMU 為重心推動歐洲整合（如前所提丹麥於 2000 年 9 月 28 日公民投票反對加入歐元，也許瑞典也會跟進，但這並不表示歐洲貨幣整合受到重創，事實上，丹麥人民並不是針對歐元得失做最後的裁決，而是擔心丹麥作為主權國家受制於超國家的歐盟體制）。英國保守黨首相布萊爾於去年 (1999) 底曾表示，在 2002 年大選時將以加入歐元為大選議題，這等於變相公投決定英國對歐洲單一貨幣的基本立場。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幾乎以德國的貨幣政策務實操作為模式，以緊縮貨幣為主軸的財經政策，相當接近美英新自由主義的傳統，照道理英國保守黨並無反對 EMU 的藉口，倒是英國當局對倫敦金融中心 (The City)，面對座落在德國福蘭克福 (Frankfurt-am-Main) 的『歐洲中央銀行』總部兩者的消長相當耿耿於懷，深怕日益失去還保有世界外匯交易中心的寶座，相信才是毫不熱衷加入歐元的主要原因。

以經濟或是純貨幣觀點來評論歐洲整合，絕對無法解析五十年來歐洲政治及經濟發展的成就，其最大的成就豈可量化：化解了三、四百年來法、德宿怨，如何衡

算和平繁榮帶給歐洲人民的安樂！

貨幣整合當然需要長期的執著地準備協調，以達成單一貨幣。從 1960 年代 IMF 以美元為主軸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崩潰，到 1970 年代歐洲貨幣體制的營建，經過漫長的折衷協調，進入 1990 年代馬斯垂克條約的簽署實施，歐洲貨幣整合的 agenda 就進入具體作業的層次。

今日的歐洲愈來愈整合 (integration)、愈來愈相互依賴 (interdependence)、愈來愈團結 (solidarity)。單一貨幣的形成其實更是從 1950 年代開始運作的歐洲建設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一步一腳印持恆建設的持續運動的一環，也是最重要的一環。總而言之，歐洲單一貨幣的形成是戰後五十幾年來歐洲整合的里程碑。

要是歐洲無法建構單一貨幣，那麼自 1993 年 1 月 1 日所實施的單一市場 (Single market) 的運作將失去其應有的功能與效應。事實上，歐洲單一市場是 1957 年 3 月簽署的羅馬條約，1958 年開始運作的歐洲共同市場的延長，而歐洲共同市場的成立卻是源自 1950 年 5 月 9 日舒曼宣言後所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1951 年 4 月開始實施）。

1992、93 年貨幣風暴的引發，對單一市場的解體威脅甚大，因此唯有單一貨幣的形成，才能消除匯率變動所觸發的國際金融投機風暴，匯率相繼貶值的不穩定危及整個國際經濟體系，因此歐洲單一貨幣的形成不僅有助歐洲經濟的發展，其實也是對全球經濟體系有劃時代的貢獻。貿易的成長，經濟的擴展對大多數國家而言是政治穩定、世界和平的最佳保障。

當然也不能機械性地將歐洲單一市場的建構做為歐洲單一貨幣創建的主因，要追究探討歐洲貨幣整合及歐元誕生的前因後果，非從戰後貨幣史的演變做個回顧，前三節已經有所分析過。

歐洲貨幣整合在第四階段『歐洲聯盟條約』（即在 1992 年 2 月 7 日在荷蘭 Maastricht 市鎮簽署，1993 年 11 月 1 日條約生效）已在第三節所探討。在本節主要是討論第五個階段『阿姆斯特丹條約』(1997 年 10 月 2 日在荷蘭 Amsterdam 市簽署) 確定單一貨幣導入的條件。

貨幣發行（紙幣與錢幣）的技術問題的解決不但費時也得付出相當成本費用。各式各樣的模式方案(modalités)已由『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九五年五月的綠皮書公告，『歐洲貨幣機構』(Institut Monétaire Européen)也在該年十一月提出可行方案。1995 年 12 月 15 日在馬德里的『歐洲高峰會議』終於達成共識。

『歐洲首長會議』(The European Council / Le Conseil européen)²³，即『歐洲國

²³ 中文翻譯常受困於歐文的表達法差異，而混淆不堪。The Council of Europe 及 the European Council (法文 Le Conseil de l'Europe 及 Le conseil européen) 就是一個例子，政治經濟學者或是新聞評論家一不留意其可能將兩者混成一體。The Council of Europe (Le Conseil de l'Europe)中文一般將之翻譯成『歐洲理事會』，該組織總部在現座落於法德邊界的城市 Strasbourg，1948 年 5 月歐洲 750 多名歐洲社會名流顯達一致體認到排除各種互不信賴的障礙，積極透過合作組織邁向歐洲政治與經濟聯盟的建構。翌年(1949 年 5 月)十個國家代表簽署『歐洲理事會』的法規。(The Statut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可是『歐洲首長會議』(The European Council 或 Le Conseil eurooéen)，英法文也用了 Council / Conseil 字眼，只是『歐洲理事會』的歐洲英法文用名詞 Europe 表明，『歐洲首長會議』的歐洲卻以形容詞 European, européen 處理。The European Council、Le Conseil européen 並無首長字眼，但參加此一會議的是政府首長 (Heads of Government, Chefs d'État et de gouvernement，法文多了一個 chef

家元首暨政府首長會議』(Le Conseil des chefs d'Etat et de gouvernement / the Heads of Government)每年至少舉行兩次重大會議²⁴，故又稱『歐洲高峰會議』(The European Summit / Le Sommet européen)，經過數次的協商終於達成 Maastricht 條約的簽署，終於擬定三個階段藉以達成單一貨幣的整合，提出幾個條件，利率(長期的利率維持在七點七左右)、通貨膨脹率(平均在百分之二點九左右)、國家債務(public debt 即國家透過公共行政融資需求，不可超過國內總生產值得百分之六十)、政府赤字財政的極限(不可超過國內總生產值的百分之三)等等。

制定 EMU 的『歐洲聯盟』條約(通稱『馬斯垂克』條約 The Maastrict Treaty)所經過的風風浪浪，贊成與反對簽署的背景將有系統地分析。這是政治與經濟辯證最具體的個案研究。為什麼英國、丹麥與瑞典不願加入歐元？為什麼希臘被排除？考量到政治與經濟因素，換句話說，(各會員國的)國家(政治)利益與迫切的經濟需要迫使『歐洲高峰會議』不得不思考歐洲整合的將來發展。歐元是將來歐洲發展的萬靈丹或是障礙？對國際政治經濟學者而言，歐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與衝擊，特別是歐元是否將扮演一個強勢貨幣角色的影響非常重要。

基本上『馬斯垂克條約』所制定的『經濟暨貨幣同盟』(EMU)三個施行階段係依照『Delors 報告』所擬定的：

第一階段(1990 年 7 月至 1993 年 12 月)進行財經改革：完成會員國間資金的自由化；針對財經趨合作基準條件作好準備；完成歐洲單一市場；各會員國之間的財稅、經濟暨貨幣領域的合作。

第二階段(1994 年 1 月至 1998 年 12 月)為歐元的創建作好準備：創立『歐洲貨幣機構』(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 Institut monétaire européen)，即『歐洲中央銀行』的前身；各會員國的中央銀行漸次趨向擴大獨立自主權限；各國在物價穩定(降低通貨膨脹)、赤字財政及公共債務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利率等的協調。

第三階段(1999 年 1 月開始)進入經濟暨貨幣同盟的運作：成立『歐洲中央銀行』；歐元的誕生；加入歐元會員國間的匯率永遠固定不變。

事實上在 1992 年簽署『Maastricht 條約』後，迄 1999 年 1 月 1 日歐元正式誕生為止，前前後後將近十年的時間一直都對歐洲整合的超國家體制以及 EMU 都有熱烈，甚至是激烈的爭辯，法國、丹麥就用公民投票解決爭端。有關歐洲貨幣整合的過程，反對與贊成的主張及經濟專家的技術報告研討都有充分的表達機會。

d'Etat，主要是法國是雙首長制，總統是國家元首，總理是政府元首，其他歐盟國家都由總理代表政府首長)，為了區隔其內涵，乃採用『歐洲首長會議』，之所以用「會議」表達，而不用「理事會」是因為從 1960 年代迄 1970 年代初『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元首及政府首長，經常會就『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進行政治性的協商，進而作成決議。從 1974 年在巴黎舉行的『歐洲高峰會議』，在當時法國總統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的提議下，通過成為定期的高峰會議，每年至少舉行兩次。其實一般媒體都以『歐洲高峰會議』(The European Summit, Le Sommet européen)替代『歐洲首長會議』，其實也可以用『歐洲審議會』表達，但不如『歐洲首長會議』或『歐洲高峰會議』那麼明確。高峰會議，其高峰意義相當明確，因為『歐洲聯盟』的任何重要決議案最後由『歐洲高峰會議』確定。歐洲單一貨幣得以通行，最主要是靠全體歐洲首長的決議完成的。

²⁴『歐洲聯盟』每隔半年各會員國輪流擔任『歐洲高峰會議』主席，並在該國舉行會議，等於檢驗各國的領導歐洲整合的能力。今年(2000)前半年由葡萄牙擔任主席，下半年輪到法國，以後依次序則 2001 年瑞典、比利時，2002 年西班牙、丹麥。之前 1998 年英國、奧地利，1999 年德國及芬蘭。

以歐元確定依照『Maastricht 條約』有關『經濟暨貨幣同盟』條款推動歐洲單一貨幣為例，產官學界的看法不盡相同，就算是學界的經濟學專家對 EMU 進行貨幣整合的步驟也有不同的主張見解。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²⁵ 於 1992 年 6 月 12 日於第十二版刊載德國 62 位自由派經濟學者，其中包括前經濟部長席拉 (Karl Schiller) 及齊爾大學的經濟研究機構 (Kiel Institute) 的退休所長基爾席教授 (Herbert Giersch) 於前一天共同署名公開發表呼籲『歐洲聯盟』當局放棄馬斯垂克條約的 EMU，至少應遲緩運作貨幣整合的聲明。他們認為，戰後德國的自由市場機制及運作相當完美的貨幣政策可以當楷模，不必進行 EMU 的建構，何況他們深深以為各參與會員國的經濟結構差距過大，達成趨合基準條件不相一致，何況 EMU 有關物價穩定基準太過鬆懈，無法與長期以來德國中央銀行貨幣緊縮為主軸藉以反通貨膨脹的政策相搭配。這些自由派經濟學者雖然覺得 EMU 是歐洲整合過程可行的長期目標，但不宜冒然立即採行。至少他們認為，將完成單一貨幣整合定在 1999 年 1 月 1 日，時間太過緊迫，會觸發紛爭，政治討價還價的結果會損及趨合基準條件的嚴謹性（如通貨膨脹及政府透支的基準條件會稀疏寬鬆掉）。就算『歐洲中央銀行』擁有高度的獨立運作自主性，主管貨幣政策的『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總裁、理事會委員倒不一定會堅持不受政治介入干擾的原則。另外，這些經濟學者也提到，『歐洲中央銀行』要穩定物價的話，應該有權調度與歐盟外的其他第三國家間的匯率，另外也要支配資金的流動等等。總而言之，他們認為，各參與會員國還沒有達成優先穩定物價的共識，所以反對冒然推動 EMU 的整合。其結論是：單一市場的完成絕對無需要一個共同的歐洲通貨 (The realisation of the single market in no way requires a common European currency)；失之過度操急引進『經濟暨貨幣同盟』終將觸發西歐極度的經濟緊張，以致政治決裂，而危及整合的目標 (The over-hasty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will give rise to extreme economic tensions in western Europe which could lead to a political rupture, jeopardizing the goal of integration)；在馬斯垂克所做的決定，卻不批判之，會危及歐洲和平的統一 (The decisions taken at Maastricht – and not the criticism of them – are putting the peaceful unification of Europe at risk) (Guardian, 12 June 1992, p.12)。

同樣的，曾在 1990 年代初擔任過『德國中央銀行』總裁的 Hans Schelesinger，雖曾承認趨合基準條件中的公共債務 (public debt) 理論上並無一套可以確切地定下可接受的大小幅度，但也跟 62 位德國經濟學者的見解一樣總覺得『馬斯垂克條約』趨合基準條件定得不夠嚴謹。事實上，在馬斯垂克條約開始進行協商時，『歐洲執行委員會』曾建議採行以國民總生產 (GNP) 的 100 % 為公共債務可接受的最高極限，然而協商接近尾聲時，卻在條約明文上定為 60 %，因為當時各會員國的平均實際債務約在那個幅度。

在推動 EMU 過程中遭遇到的最棘手難題，倒不是純經濟技術層面的物價、通貨膨脹、政府支出、利率等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層面，攸關歐洲人民大眾的生活

²⁵ 『衛報』刊載 62 位德國經濟學者的公開聲明的同時，於該日第二十一版也登了德國『時代報』(Die Zeit) 編輯綜馬 (Theo Sommer) 的「躍出戰壕」(Out of the Trenches) 的專欄稿，分析統一的歐洲對德國是何等的重要的見解，但沒有特別提及歐洲單一貨幣的整合。

難題，例如結構性的失業、貧困化所衍生出來的社會支離破碎現象以及人口年齡老化的難題，都會衝擊到各國政府財政支出及產業在經濟科技全球化的競爭力，進而影響到赤字財政、國家舉債的極限困境，這都是 EMU 所要面臨的挑戰。

1990 年代以降，歐洲各國都遭受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困苦，1994 年 12 月『歐洲首長會議』曾通過解決高失業的五點方案 (Five-point Programme)。

其實德國經濟學者的主張與以前『經濟學者派』(Economists)與『貨幣學者派』(Monetarists)爭論有其一致性；德國經濟學者一貫強調各國的經濟條件漸漸趨合後，才進行貨幣的整合。以法國為首的其他國家經濟學者，則認為可以進行貨幣整合，透過整合過程協調各會員國的經濟政策。EMU 的建構事實上就是兩派的折衷方案。

四位參與介入 EMU 協商過程甚深的經濟學家 Paul de Grauwe, Daniel Gros, Alfred Steinherr 及 Niels Thygesen (Europe Documents, 8 July 1992, pp.1-4, 參見 Minkkinen and Patomäki, 1997) 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認為『歐洲聯盟』應該繼續進行推動貨幣整合，否則要付出的代價將是高昂的，理由至為淺顯，如果中途放棄 EMU 會挫損『歐洲聯盟』的信譽至鉅，甚至引發金融市場的騷動風暴。

此外，他們也認為反對貨幣整合的理由站不住腳，固然各國的經濟條件不一樣，應對經濟不景氣的方案也不同，但是靠傳統的貶值方式來刺激經濟發展實際上早已失去實效性。以日本在 1970 到 1980 年代為例，日幣頻頻升值，卻無損其在國際經貿上的優勢地位，美國剛好在同時期，處處居於被動，也無法靠貶值重振戰後初期到 1960 年代當年美國產業在全球的雄風。貶值既然無法改善經濟競爭力，輸入必需品，特別是靠進口原油的國家反而受到通貨膨脹的壓力。

結論當然是 EMU 應該繼續往前推進，別無其他選擇餘地。十年的爭辯結果，如今有了清晰的輪廓可循，歐元也無退縮的道理，走回頭的路已經全部斷絕，單一貨幣的解體不可思議，解體的過程遠比整合時的還艱辛困難。在 1950 年代，歐洲整合的大功臣莫內早就倡言過，歐洲整合一定在充滿危機與曲曲折折的過程中往前邁進。用來檢驗 EMU 的實踐過程，莫內的遠見再確切不過！

EMU 的運作既然是構築在協調上，『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及歐盟各國中央銀行間的經常協作，對於全球的投機性的資金流動可產生某種程度的嚇阻作用，必要時可聯合各國對國際資金移動課取投資特別徵稅。

由於歐洲整合是以法、德兩國為主軸發展起來的緊密關係，致使英國根本無法在『歐洲聯盟』中有發揮巨大影響力的空間。事實上，『歐洲聯盟』的發展從 1970 年代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後，因法、德兩國長久政經合作經驗而鞏固的友誼，使得其他會員國接受這兩個主要國家，特別是法國的政治實力，德國的經濟影響力所形成的歐洲整合事實。所以目前『歐洲聯盟』有雙速度(two-speed)的整合運動，一種是以法、德為主軸的整合速度（社會條款、歐元）；另一種是無法與法、德跟進的速度，英國顯然是屬於後者。

當然，英國之所以會以慢一點的速度 (tempo) 進行歐洲整合，還有其他因素，譬如，法律習俗制度的差異。英國的法院是屬於英國政治體制構成的部分，但是歐洲法院體系卻非如此，並且受法國的影響甚鉅，所以英國在詮釋歐盟法律時，難免與之有偏頗。雖然如此，基本上，英國對歐洲法院的程序及解釋方法仍發揮其正面的影響力。事實上，英國有許多政府結構或體制與其他歐盟國家不同，但這絕非優

劣的問題，而是有所差異不同而已。

總而言之，英國一直對其傳統的國家主權很在意，擔心不再是一獨立自主的國家。英國政府相當仔細地評估參加歐盟的利弊得失，咸認為任何一個客觀的評估都必須考慮到英國的貿易量應該比其他歐盟國家多。事實上，英國比歐盟其他會員國更依賴全球貿易。1994 年英國對全球的出口貿易總值為 58%，但對歐盟卻只有 42%。

當然英國之不願意加入歐元還有其他理由。從經濟層面而言，與其他各國的論據都一樣，就是擔心無法運用傳統的經濟、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發展，以促進就業。英格蘭銀行（英國中央銀行）總裁喬治(Eddie George)於 1995 年曾表示如果實行單一貨幣，『歐洲聯盟』各國將面臨嚴重的問題，因各國的經濟繁榮與就業率有很大的落差。失業的長期問題反映出歐洲勞力市場的結構性特徵 — 薪資彈性的程度與非薪資社會成本(non-wage social costs)的層次(Holmes, 1996, p.255)。單一貨幣制度將使原本失業率就高的國家，沒有任何改善的空間。若以經濟學家的行話來說，單一貨幣制度的外在挑戰或「衝擊」對於歐洲經濟將產生失衡的效果。事實上，這也是這幾年法、德及其他歐陸各國「短期的陣痛犧牲」所付出的代價，藉以換取長期的利益所作的抉擇。在進行『馬斯垂克條約』簽署過程中，英國對歐洲貨幣整合也採取以往一樣的審慎的態度²⁶，因此在簽署『馬斯垂克條約』時，以 opting out 方式處理，是以實際利益考量為出發點。

『馬斯垂克條約』假設所有的會員國都會「盡力」達到趨合規範中所設定的條件。但問題是，會員國是否將此視為他們該盡的義務而努力去達成馬斯垂克條約所要求的目標。目前最難達到的是第 3a 條第 2 項，該條規定共同體應包括達到單一通貨 ECU (歐元以前的名稱) 不可改變之固定匯率，單一貨幣政策及匯率政策的定義及實行。英國即是引用此條約而選擇不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會員國在實行其經濟政策時，應以其能對共同體目標有所貢獻為主要目的，並以第 103 條第 2 項中所規定的指導原則為基礎。會員國應將其本身經濟政策視為共同利益的一部份，且應與理事會協調以符合第 102a 條的規定。

會員國在實行其經濟政策時，應以其能對共同體目標有所貢獻為主要目的，並以第 103 條第 2 項中所規定的指導原則為基礎。會員國應將其本身經濟政策視為共同利益的一部份，且應與理事會協調以符合第 102a 條的規定。

第 109m 條中規定：(1)於第三階段開始之前，各會員國應視其匯率政策為一共同利益，藉此，會員國應就『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及發展歐洲通貨單位合作所獲得之經驗加以考量，並尊重此方面之職權；(2)自第三階段開始及如果有一會員仍享有例外遭除名時，第 1 項應仍準用於該會員國的匯率政策。

很明顯的，以上條約的確將實現『馬斯垂克條約』的義務加諸在英國身上，尤其是第 109m 條要求英國在第一及第二階段須將匯率政策視為共同利益。而在第三階段開始之後，英鎊仍是一獨立的通貨。

假設英國仍不加入『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歐洲法院可

²⁶ 也許可用狐疑兩字來形容英國人對歐洲大陸人的無法信任感。不過真正的理由當然不是心理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正如英國未加入馬斯垂克條約的社會條款一樣，英國之不加入外匯機制或是歐元是基於擔心會引發對其國內無法控制的衝擊因素的考量。

依馬斯垂克條約中對『羅馬條約』所修正的第 171 條判決英國破壞條約中所規定的義務。英國若不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那麼就沒有資格在『歐洲中央銀行』當局(Governing Council)²⁷ 中投票表示意見，而僅能遵守做成的決議，沒有任何權利發表意見。如此看來，英國不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實為不智之舉。

雖然如此，英國對歐洲貨幣制度採觀望的態度，有其理由。至少以英倫的 The City 金融中心而言，如果加入歐洲貨幣整合，英國勢必會喪失其金融優勢地位，而有被德國福蘭克福取代為歐陸金融中心的威脅感。其實就算英國不加入歐元區(Euroland)，長遠而言，除非歐元本身在開始運作初期（五年內）沒有達到所期許的益處，甚至因 Euroland 十一國體制區無預估地發展經濟，而困難重重，英國還是會加入歐元區的，就像當年莫內所持的理由，只要對英國有利，也就是說只要歐元運作通暢無礙，英國一定會放棄 opting out。

事實上，英國不加入 EMU，也有其後遺症。很明顯的，英鎊是較歐元弱勢的通幣，必須靠高利率來維持幣值，如此將導致通貨膨脹壓力不斷的升高。目前，英國因不加入歐元，無法進一步吸引營運良好的跨國企業前往投資，其產業與歐陸的相較是否能維持較高的競爭力，恐怕無法確定。由於較高的外匯交易成本，以及英鎊亦喪失其可發揮的空間，因此英國企業相反的會失去競爭力，因而威脅英國的貿易在國際市場的優勢。英國的製造業已受到威脅，中小企業經營更加困難。

根據對英國前五百大企業中的一百位金融主管的電話訪查中可發現，其中 71% 希望歐洲單一貨幣能在 1999 年實行，86% 則希望在兩年後實行。幾乎有三分之二的主管相信單一貨幣對他們的公司是有幫助的，28% 則不確定單一貨幣是否會對公司有益，另 12% 持反對意見 (Ian D. Davidson, 1996, p. 139)。

事實上，英國遲早還是會加入歐元的。其理由是，美、日企業及金融機構早已接受歐元這個事實，進而積極運作。歐元與英鎊間的匯率是否如英國所企願的，能穩定下來？金融風暴的引發會促使經濟強勢與弱勢間做重新的排列組合。1950 年代末葉歐洲自由貿易區與歐洲共同市場間的較量是否會重演？

1999 年 1 月 1 日，歐元正式成為『歐洲聯盟』十一個會員國的單一貨幣。『歐洲中央銀行』副總裁諾瓦葉 (Christian Noyer 於 1998 年 10 月 1 日在巴黎宣稱，「歐元是歐洲真正地且永遠地達成穩定價格目標的契機，穩定價格是經濟強勢與均衡發展的源泉²⁸。」任何學經濟的人都無法挑戰這一基本目標；德國戰後馬克之所以為德國人以及世人所稱道，就是馬克發揮了價格穩定的功能，保持了馬克的幣值，進而使得德國經濟能進一步發展，這是德國總結了從 1920 年代前半及 1940 年代後半慘痛的通貨狂飆 (hyper-inflation) 經驗，所得到的嚴峻教訓。問題是，歐元區十一國的經濟、社會條件並不一致，為了達成此一穩定價格的終極目標，勢必要求各參與會員國放棄以刺激就業率提升或是維護社會安全體系的傳統財政、經濟政策。『歐洲中央銀行體系』 (Système européen de Banques centrales) 從 1998 年 7 月 1 日取代

²⁷ 有權決定 ECU (Euro) 之通貨匯率。

²⁸ "L'euro est l'occasion d'instaurer vraiment et durablement en Europe l'objectif de stabilité des prix; qui est à la source d'un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fort et équilibré." (<http://www.ecb.int/key/sp981001.htm>, p. 1)

『歐洲貨幣機構』及各會員國的中央銀行，正式營運。

毋庸置疑的，價格的穩定對企業經營者而言，等於是達成有效經營管理的重要指標，投入產出的各種要素都得透明化，提升效益與競爭力，總體經濟也因而得以改善。另外，價格的穩定當然也是企業得以長期投資，長期規劃人力資源的支柱。當然如果價格體系無法穩定下來，則社會不得安寧。整個貨幣體制的崩潰，對於絕大多數的固定受薪者及貧困的社會低層者所受的打擊，絕對不是整個社會能承擔得起的。

總而言之，單一貨幣歐元對歐洲整合的利基從長期觀之絕對佔優勢，至少有四項大利基：

1. 促進貿易與投資：消除了會員國間的貨幣匯率，等於減少了貿易的不確定因素，投資者因匯率浮動而裹足不進的過慮也因而消失。企業可進行長遠的規劃，提高競爭力；
2. 遞減成本：歐元實施前，企業為了經貿得付出高昂的成本，維持外匯管理的成本，有一部門專門負責外匯的買賣。而今不僅負責管理外匯的人員薪資可省下，最主要的是可節省龐大匯價差額與外匯手續費。根據「消費者歐洲組織」(Bureau Européen des Consommateurs)的研究，如果有消費者決定到十二個（盧森堡與愛爾蘭除外）會員國旅遊，一百塊錢匯兌十二次的結果，就要被扣去 45 % 的匯價差額及手續費 (Jean-Michel Floc'hlay, 1996, p.40)；
3. 交易透明化：歐元的使用可以更有效地比較各會員國企業的績效，不必為價格、會計與預算的差異傷透腦筋。同樣一個產品在不同的國家生產就可拿來比較，可以測知哪個廠商的營運績效的高低；
4. 歐元的國際競爭力：有了 2 億 9 千萬人口（歐盟共有三億七千五百萬人口，減去英國、瑞典、丹麥及希臘的人口），市場遠比美國（將近 2 億 7 千多萬人口與日本的 1 億 2 千 6 百多萬人口）龐大，如果歐元能持續發展，歐洲在世界經貿的地位一定會增高（參見本論文結語第三表）。

第五節 法國對歐洲貨幣整合的基本立場

客觀地觀察分析這五十幾年來的歐洲整合史，基本上可以說是由法國主導，卻由德國積極搭配完成。1950年5月9日倡議創建『歐洲煤鋼共同體』的舒曼及莫內是法國人，就是在1990年代積極倡議進行單一貨幣的 François Mitterrand 總統也是法國領導者人，其實就是1970年代倡議建構『歐洲貨幣制度』的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總統也是法國政治人物，理由不難瞭解；德國因為戰敗，無實力及信譽領導歐洲。法國則從1870年到1940年間被普魯士、德國蹂躪摧毀三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陣營脆弱的冷戰體系有隨時一觸即發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因此在美國施壓下，法、英得面對西德整軍的挑戰，以抵制蘇聯的威脅。在這種高政治敏感度下，法國朝野被迫不得不去思考任何可以讓法國人民接受的方案，才有莫內的提議，舒曼靈活接受莫內的創舉，宣佈法、德修好，共創『歐洲煤鋼共同體』的計畫，歐洲才總算步上整合的坦道。當時德國總理 Konrad Adenauer 不僅是在戰時是個抵制納粹的民主鬥士，也是急於提升西德敗戰後的政治地位（特別是當時四強還分別佔領東西德），因此迫不及待地積極配合舒曼的善意和解的宣言。

之後，戴高樂在1958年再度上台執政，法國在歐洲事務的政治地位取於主導的地位，德國戰敗的陰影依然不散，Konrad Adenauer 自然而然地配合戴高樂主導的歐洲整合。一直到德國經濟奇蹟為世人所羨慕的1970年代，西德還是同意以法、德為主軸，法國在歐洲政治議題上領導，德國則憑著經濟實力主導歐洲的經濟整合。

(1) 戴高樂的歐洲整合理念

要瞭解法國對歐洲整合的基本立場，則非深入探討戴高樂的歐洲理念不可。首先觀察他再1946年1月辭去臨時政府主席後，到1958年5月再度掌權，在這十二多年在野期間，戴高樂如何批判法國第四共和的歐洲事務政策。當然更得解析比較戴高樂在野時期的歐洲理念與他握有實權，在第五共和總統任內長達十一年多的主政時期(於1969年辭去最高元首職)到底有何異同？既然戴高樂堅決反對莫內的『歐洲煤鋼共同體』超國家體系歐洲整合理念的實踐，為何在他重掌政權時，不僅沒有杯葛『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運作，而以法、德為主軸，繼續推展歐洲整合，卻不顧其他五個會員國的意願，兩度(1963年及1967年)否決了英國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經過十二年的蟄伏(1946-1958)後，戴高樂於1958年5月在第四共和無法面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武力抗爭幾乎觸發內戰的危機中，復出掌權。從創建第五共和到他辭下總統職間(1958-1969)，正好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發軔的關鍵時期。對熱切推動歐洲整合發展的政要及社會有力人士而言，戴高樂的復出讓他們憂心忡忡，無異投下了不可確定的陰影。此種憂慮不難了解，原因是戴高樂在野時，

曾對『歐洲煤鋼共同體』，尤其是各會員國積極協商簽署羅馬條約，創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超國家體制」批判不遺餘力。他對莫內、René Plevén 等人積極運作創建『歐洲防衛共同體』(1954) 更是反對到底，終於在法國國會拒絕同意下，胎死腹中。

到底戴高樂將軍於 1958 年再度掌權後，將如何「處理」已經建制且已行之有年的歐洲共同體？成了歐洲人乃至美國人關切的議題；也許戴高樂會放緩歐洲整合的速度，甚至杯葛『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體制。難道「膽敢」孤注一擲銷毀『羅馬條約』？其實這種顧慮是多餘的，戴高樂不是武夫，更不是獨裁極權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對國際政治軍事已有透徹的研究心得，何況怎樣化解法國內戰危機，如何處理解決迫在眉睫的阿爾及利亞棘手難題，無法讓他分心「關注」歐洲整合 (Bossuat, *Les fondateurs de l'Europe*, p.217)！果然戴高樂一上台，完全接受 1957 年 3 月 25 日簽約的『羅馬條約』條款²⁹。不但不反對歐洲整合的運作，法國也積極參與。為了加速法國經濟的現代化，除了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架構下進行大規模投資，軍事裝備強化外，於 1958 年 12 月在 Jacques Rueff 的創導下大行貨幣改革，法郎也順勢貶值了 17%，增加了法國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的貿易競爭力。

1958 年 9 月 14 日 Konrad Adenauer 到戴高樂的鄉居 Colombey-les- Deux-Eglises 訪問，其聯合公報曾清楚地標誌法、德兩國緊密合作，以營建歐洲的發展，加強大西洋同盟，進而維護世界和平³⁰。歐洲整合雖然歷經多次的危機，但是依舊能日日發展，這與戴高樂及愛德諾從 1958 年就開始建構的法、德為主軸的歐洲整合息息相關。

法、德最具體的合作例子莫過於花費了將近八年的協商，終於完成了棘手的歐洲共同農業政策 (*La politique commune agricole, CAP*) 的制定。德國是個強大的工業國家，其產品擁有競爭優勢，需要廣大的歐洲市場，可是也希望能自全球各地購置較價廉的農產品。而法國雖然亦有相當的工業基礎，但是卻希冀能以高於世界農價，售出剩餘的農產品到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其他會員國。在討價還價下終於達成協議，法國得到歐洲共同農業政策所要的好處，但是德國卻也因而得以擴大其歐洲的產業市場。歐洲共同農業政策主要是建基於歐洲共同市場內的自由流通原則，保障並統一每個農產品的價格，會員國以購置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農產品為優先，1962 年 1 月 14 日成立了『歐洲農業平準保障基金』 (*Fonds européen d'orientation et de garantie*

²⁹ 戴高樂與舒曼、莫內的歐洲整合理念不認同。曾表示過，「有人說我反對歐洲，我是反歐洲者，這錯了。我是反對法國在被裁割殘全的歐洲失去他的獨立性，成了德國的僕從，我反對的是六國組成的歐洲，因為這種歐洲違反法國全世界的使命。」(On a dit que j'étais contre l'Europe; que j'étais anti-européen, c'est faux: Je suis contre une Europe mutilée où la France perdra son indépendance et deviendra le valet de l'Allemagne; je suis contre l'Europe des Six car elle est contraire à la vocation universelle de la France.) (Bossuat, *Les fondateurs de l'Europe*, 1994, p. 218)

³⁰ Nous avons la conviction que la coopération étroite de la RFA et de la RF est le fondement de toute œuvre constructive en Europe. Elle contribue à renforcer l'Alliance Atlantique et elle est indispensable au monde. (Bossuat, op. cit., p.219)

Nous pensons que cette coopération doit être organisée et, en même temps, inclure les autres nation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avec lesquelles nos deux pays ont des liens étroits. Nous désirons qu'elle s'exerce à l'avantage de tous les peuples dans le domaine des grands problèmes du monde. Nous souhaitons qu'elle s'étende au plus grand nombre possible d'Etats européens.

agricole)。

事實上，在『戰鬥法國』(La France combattante)、『自由法國』(La France libre)時期，特別是 1943-1944 年戴高樂在阿爾及利亞首邑 Alger³¹ 時，曾倡議過成立以法國與荷、比、盧為主軸的『西方聯盟』(Fédération occidentale)。1945 年戴高樂也曾有過以英、法兩國為核心成立一個經濟實體的構想。1950 年 5 月 9 日舒曼呼籲法、德等歐洲國家，倡立『歐洲煤鋼共同體』，英國不屑加入，當時實際起草舒曼宣言的莫內，雖然表示遺憾，但他相信英國遲早是會加入歐洲整合³²。在 1960 年代，加入或是不加入一直困擾著島嶼性格強烈的英國人，嚴峻地考驗這種傳統的孤立性格，可是眼看形勢的丕變對英倫愈來愈不利，英國的政治人物、政黨與企業集團不得不思考長遠的發展策略。

邱吉爾當年 (1946 年 9 月 19 日) 在蘇黎世大學演講，呼籲歐洲人民團結一致，邁向歐洲合眾國發展，因在他心目中英國擁有大英國協及親密關係的美國做後盾，英國不必加入，依然可保持傳統獨立自主的國際地位。豈知英國的國力，在戰後十幾年間卻急速衰退，當 1956 年莫內積極運作其剛創立的『歐洲合眾國行動委員會』，為『歐洲經濟共同體』催生時，英國依舊持敵視的態度，拒絕參與任何有損其國家主權的國際組織。1951 年英國就是無法接受『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最高總署 (Haute autorité) 這種超國家架構，為了對抗『歐洲經濟共同體』，英國乃聯合瑞典、瑞士、奧地利等國成立『歐洲自由貿易』組織，可是居於西歐地理核心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即通稱的歐洲共同市場) 六個創始國 (法、德、義、荷、比、盧) 於 1957 年 3 月 25 日簽署『羅馬條約』後，因地理鄰近的關係，在關稅相繼消除過程中，沒幾年共同市場的會員國經貿快速成長，規模經濟亦發揮應有的效應。在這段期間，英國為首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卻無預期的成果，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差距愈來愈大³³，不得已英國朝野終於如莫內所預測的現實起來，在 1960 年代初有了共識³⁴。英國工黨執政時，於 1963 年正式向『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申請願意加入十幾年前英國所堅決反對的組織。因為如果英國不加入的話，或是繼續被排除在活絡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外的話，英國恐怕註定永遠無翻身的空間，國力日衰的結果，命運將是淒慘的³⁵ (John Pinder, 1961, p.1)。在這個漫長的整合時段，英國從來沒有扮演過整合的關鍵角色，特別是在歐洲貨幣整合層次，英國一直採取被動的，甚至是保留的立場，迄今還沒加入歐元。

1965 年戴高樂與『歐洲經濟共同體』首任 (1957-1965 期間) 執委會主席德籍的哈爾斯坦 (Walter Hallstein, 1901-1982) 間的爭論，多少給人一個印象，以為戴高樂

³¹ Alger 英文拼為 Algiers。

³² 莫內到底瞭解英國相當現實 (pragmatic)，他對英國人的心態有深邃體驗。果然十年後，英國人終於不得不走回頭，要求加入『歐洲共同體』。

³³ 『歐洲共同體』由於經濟規模的擴大，歐陸大企業的合併，不僅在共同體內提升競爭力，甚至在區域外的世界市場也愈來愈能攻佔 market share，這是英國大企業雇主最感到無法抵制的威脅。

³⁴ 當時英國朝野辯論加入『歐洲共同體』時，當然著重短期的經濟效益，其實以 1950 年代末期來考察英國的實況，大英國協貌合神離，無法發揮應有的經濟利益，而美國與蘇聯兩霸權體系的確立，美國的全盤利益考量遠高於與英國保持特殊的利益。從大企業的利益著眼，英國的狹窄市場以及鬆懈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無法壯大英國產業的競爭力。

³⁵ 國力衰退等於英國自十七世紀以降在全球的政治影響力將無可避免地消失殆盡。

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死對頭。事實上，戴高樂在其執政期間雖然對『歐洲經濟共同體』有過不少的「干擾」（有過兩次 veto 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申請，或是 la chaise vide 空椅子的記錄），但基本上他對歐洲經濟整合的「實績」絕不能否認。弔詭的是，固然戴高樂會「干擾」過『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運作，但歐洲整合，特別是其經濟成長並不因「干擾」而萎縮，正好相反，1960 年代歐洲高度的繁榮，證明了莫內所說的歐洲是在整合危機中邁前進步。事實上，法國在戰後重建三十年（1945-1975）曾有過《Les trente glorieuses『光輝三十年』》(Fourastié, 1979)。1950 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削減關稅，擴大市場，大力促進自由貿易的結果，法國的經濟現代化更加快速，這也是戴高樂接受『羅馬條約』的主要原因之一。

戴高樂強烈維護 Etat-Nation 的主權，近乎神聖得不容侵犯的地步，這也是他被歸為法國的民族主義者的原因之一。戴高樂的歐洲整合理念與他對法國在歐陸所扮演的傳統地位觀無從分割；他是標準的 Etat-Nation 捍衛者。從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後，法國一直是歐陸政局舉止輕重的國家，然而後一百三十多年來，特別是 1870 年普法戰爭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先後受新興的強大德國躉辱侵佔，割土求和，對職業軍人的戴高樂而言，當然無法脫離傳統的國族國家的主權理念範疇。捍衛主權的獨立則非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不可，因此戴高樂於 1958 年 5 月重掌政權後，就積極制訂新憲法，以民主和平的方式，進行政治體制的更變 (coup d'Etat)。無疑的，戴高樂個人傾向握有實權的總統制，然而已有數百年的議會內閣制度（第一至第四共和）歷史傳統非常根深蒂固，不是戴高樂個人能隨意廢棄的。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全面武裝挑戰殖民當局，法國內戰有一觸即發的危機，以及第四共和內閣體制癱瘓的嚴峻局勢下，戴高樂終於與軍方與政治人物達成協議，妥協的結果，新的第五共和體制給予法國總統握有實權，特別是在外交與軍事領域，總統高居主導國內外政治的強勢地位，法國終於告別內閣紊亂不穩的第四共和體制。

第五共和成立前，即 1957 年，在第四共和體制下法國與其他五個會員國簽署『羅馬條約』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戴高樂對所謂的超國家體制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非常敵對，但因為法國新體制還不穩固，國內依然籠罩在內戰的陰影下，如何儘早解決阿爾及利亞殖民地的難題是戴高樂的亟需處理的內政要務。後來在其《希望回憶錄：再興 1958-1962》(Mémoires d'espoir: Le renouveau 1958-1962) 中，戴高樂對歐洲超國家 (supranational) 批評不遺餘力，他的歐洲整合理念與莫內南轅北轍。戴高樂認為由技術官僚主政以及大多數是外國人組成的議員表面上說是替歐洲立法，其實根本就是無視法國的國家利益³⁶。他對由美、蘇主導的國際政治當然也無法接受，雖然基本上法國與美國的長遠政治利益應該一致，但是戴高樂卻認為依

³⁶ Pour l'école dirigeante de chaque parti politique; l'effacement de notre pays est devenu une doctrine établie et affichée. Tandis que, du côté communiste, il est de règle absolue que Moscou a toujours raison, toutes les anciennes formations professent le "supranational", autrement dit la soumission de la France à une loi qui ne seroit pas la sienne. De là, l'adhésion à "l'Europe" vue comme une construction dans laquelle des technocrates forment un "exécutif" et des parlementaires s'investissant du législatif - la grande majorité des uns et des autres étant formée d'étrangers - auraient qualité pour régler le sort du peuple français. (Paris, Plon, 1970, p.215)

附在北大西洋公約上，等於將法國的軍事安全全盤交付給他國（美國）³⁷。

換句話說，戴高樂的歐洲整合理念是以捍衛主權獨立國家為最高指導原則的國際關係，反對戰後冷戰體系美、蘇超霸主導瓜分全球的政治利益體制，這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處處受制於羅斯福與邱吉爾的經驗有關，其實勿寧說是戴高樂對法國傳統的歷史地位的體會評價息息相關。

戴高樂對歐洲整合的理念於 1960 年 9 月 5 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更有進一步的表態：「歐洲的實況是什麼？建構歐洲的支柱是什麼？國家的確是建構歐洲的支柱。當然各國都不同，都有各自的靈魂，各自的歷史，各自的語言，各自的光榮與抱負，然而國家是唯一有權支配，有權處理的實體。以為可以超越國家，並在國家之外經人民同意，就可以建構有行動效率的東西，不過是空想。肯定地，在面對歐洲整體上的問題之前，確實可以先創建一些多少是國家外的機構 (*il est vrai qu'on a pu instituer certains organismes plus ou moins extra-nationaux*)。這些機構有其技術價值 (*valeur technique*)，然而卻沒有、也不能有權力 (*et ne peuvent avoir d'autorité*)，因此無實際功效。[...] 法國認為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防衛領域裡確保西歐經常的合作不僅是適當的，可行的而且是實際的。這樣需要有一個有擔當的政府所組成的經常性協調機構 (*un concert organisé régulier des gouvernements responsables*)，然後也需要在共同領域裡有各特殊的機構但隸屬於各政府的工作；另外也需要有個定期性的由各國議會代表組成的大會。依我的見解，也應該儘早舉行莊嚴隆重的歐洲公投，給於這一剛起步的歐洲 (*ce départ de l'Europe*) 有個人參與贊同的特徵。」(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avec le Renouveau 1958-1962, Paris, Plon, 1970, pp.262-263)。

如前面所述，在莫內積極運作下，時任法國外長的舒曼於 1950 年 5 月 9 日宣佈創立『歐洲煤鋼共同體』，以這一具體的提議進行法、德的重修和好，這個提議也獲得西德總理 Adenauer 的熱烈反響。翌年 (1951)，西歐六國遂簽署巴黎條約，莫內也因此榮任『歐洲煤鋼共同體』首任的最高公署 (*Haute autorité*) 主席。這一劃時代的超國家體制，於 1957 年 3 月 25 日六國簽署『羅馬條約』時，仍然存在，但而後由『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主席替代。當初簽署『羅馬條約』六個創始國有個共識，希望執委會是個能體現簽署國的共同意志，以協調方式進行推動歐洲經濟整合的領導，比最高總署的主席更有協調的權限，至少不在限制於煤與鋼兩產業部門，而是涵蓋所有的經濟部門。執委會主席及委員固然是由各會員國推派，但並不代表各會員國，不維護各會員國的權益，其決策過程是以共同體的發展為依歸。質而言之，執委會是個由超國家技術官僚運作的組織。

可是基本上，戴高樂則強調『歐洲經濟共同體』應該是個由主權獨立的國家為基準緊密合作的區域組織，不過他卻承認有必要成立由各會員國組成共同協調的機構（當然不是莫內所倡議的超國家機構）。換句話說，戴高樂心目中的協調機構不

³⁷ De là, aussi, la passion pour l'Organisation atlantique qui mettrait la sécurité, par conséquent la politique, de notre pays à la disposition d'un autre. De là, encore, l'empressement à subordonner les actes de nos pouvoirs publics à l'accord d'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es où, sous les apparences de délibérations collectives, s'exerce en toutes matières, politiques, militaires, économiques, techniques, monétaires, l'autorité suprême du protecteur et où nos représentants, sans jamais dire: "Nous voulons", ne feraient que "plaider le dossier de la France".

能超越任何國家的主權而獨自運作，採行所有會員國一致同意，達成共同的決議，最後才由執委會負責執行之，協調機構才能發揮其協調的功能。執委會當然可以研究可行的方案，並居間協調各會員國的提議案。

雖然如此，但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實際運作時，或是以後的『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實際上有時接近莫內的超國家體制（歐元的『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就是個好例子），可是在 1960 年代卻較接近戴高樂的協調機構（特別是戴高樂於 1963 年 1 月首次否決英國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另外一次就是 1965 年 7 月至 12 月戴高樂拒絕派出代表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部長理事會 的『空椅子事件』*(empty chair)*。1966 年 1 月所謂的『盧森堡妥協』(*The Luxembourg Compromise*) 更是確立了戴高樂所主張的各會員國的權力高於『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的原則。

(2) François Mitterrand 與歐元的誕生

在『歐洲高峰會議』達成 EMU 及爾後繼續強化貨幣整合的政治經濟協商中，各個國家都分別從各自的權益考量立場。法國在經濟實力上無法與德國相較量，但是戰後積極主導歐洲整合的「業績」及企圖雄力迄今未嘗衰減，特別是 1989 年東德崩潰，德國走向統一之途，這不僅對法國有相當大的衝擊，連其他歐洲各國也受到影響，如何消除德國傳統霸權支配歐洲大陸的潛在憂慮，當然是歐洲領導人物所需面臨的棘手難題。

對執政十四年 (1981-1995) 之久的法國總統 François Mitterrand (1916-1996) 而言，他很在乎在其任內解決德國統一帶來的衝擊疑慮。為此他取得德國當時的總理 Helmut Kohl 的全力合作，優先進一步推動歐洲貨幣整合，以建構歐元為其消除德國統一後的「霸權」疑慮³⁸。爾後 EMU 之能夠剔除各種障礙困難，與德、法對歐元達成的共識攸關至鉅。

為了掌握時機，Mitterrand 乃在 1989 年 12 月在 Strasbourg 召開『歐洲高峰會議』積極運作，以 1990 年歐洲『政府間會議』(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進行確定依照『Delors 報告』的貨幣整合運作。Mitterrand 的適時提議在『歐洲高峰會議』除英國有保留外，獲得其餘十一國一致的贊同，決議通過。確定從 1990 年 12 月起同時舉行『經濟暨貨幣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及『政治同盟』(Political Union)之歐洲『政府間會議』，以修正『羅馬條約』之相關規定及『Delors 報告』所擷取的『經濟暨貨幣同盟』(EMU)之第二、第三階段之運作的協商準備。繼之各國乃在 1990 年 6 月『歐洲經濟共同體』在愛爾蘭都柏林舉行『歐洲高峰會議』，會中法、德兩國聯袂提議要求『歐洲經濟共同體』執行委員會草擬出『經濟暨貨幣同盟』(EMU) 條款以修正『羅馬條約』，並確定歐洲『政府間會議』責成於 1990 年 12 月 31 日舉行，目標定 1992 年底為新條約簽署的最後期限。

不過就算 Mitterrand 有多麼大的決心，歐洲貨幣整合假使沒有德國基督教民主黨總理 Kohl 的強力配合，最後恐怕會功虧一簣呢。Kohl 在長達 16 年的任內 (1982-1998)，在德國統一前，他毫不動搖地接受 Mitterrand 在 1988 年的提議，由

³⁸ Martin Feldstein 也認為剔除德國霸權是歐洲各國推動 EMU 的動力。(Feldstein, 1992)

法、德為主軸繼續進行歐洲貨幣整合，在二十世紀前完成單一貨幣的建構。Kohl 洞察世局的演變，相當有政治智慧與勇氣接受此一挑戰，化解德國輿論對歐元的敵視，毅然決然地運用國家的機器達成歐洲單一貨幣的協議。

從 1989 年 10 月柏林圍牆崩盤後到 1991 年 12 月簽署『馬斯垂克條約』確立達成歐洲貨幣整合的三階段，Mitterrand 與 Kohl 兩者透過政治協商確定貨幣整合的日程表後，剩下來的技術問題（達成實質如何實踐整合的模式條件）則由各會員國的財經部長及各國中央銀行等高級技術官僚協商，但絕對不能推翻政治共識。

實際上，法國倒不一定只是考量到德國統一後會帶來歐洲均衡的傾斜，最主要的還是法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歐洲以對抗美、蘇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社會，也考慮到美、日等國的科技產業對法國的威脅。透過 EMU 進行歐元的建構，不但可以增強『歐洲聯盟』與美國及日本在國際舞台上的協商實力，就是法國也可因此在 G7『世界七大工業強國高峰會議』（如今增加了俄羅斯成為 G8）、『世界貿易組織』(WTO) 及『國際貨幣基金』(IMF) 或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 發揮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勿庸置疑的歐元透過『歐洲中央銀行』及歐盟各國的財經部長的協調合作，對世界財經政策的走向也能夠發揮抵制美、日的經貿主導權的強勢作為。特別是歐洲資本市場的拜賜於單一貨幣將更加擴大。

* * *

五十年來歐洲整合的經驗，從『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建構到今日『歐洲聯盟』的貨幣整合，歐元雖然還有段曲曲折折的過程有待考驗，但基本上歐洲再退回分繩離兮的舊觀，遠比往前邁進還更加困難。二十一世紀的歐洲景觀將在莫內與戴高樂兩位的歐洲整合的理念基礎上繼續發展。從政治與經濟層面來考量的話，歐洲整合機制應該還是會在 supranationalism 之 intergovernmentalism 之間搖擺徘徊漸進，因為在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勢必影響到歐洲聯盟各會員國人民對社會與文化層次的反省與憂鬱。市場導向的全球化必然會刺激歐洲人民去尋求獨特生活方式與經濟成長間的平衡，而非一味地跟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後塵，追求美國的生活方式。超國家體制（如『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運作，單一市場的擴大，經貿財政的協調，軍事安全體系的鞏固）有利歐洲經濟的發展，但是歐洲人民社會安全保障與各自獨特文化的发展多多少少還是會誘導主政者保留數世紀來的 Etat-Nation 的運作，因此國與國、政府與政府間的協調還是歐洲整合的主要機制之一。總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紀可預見的將來，歐洲的整合機制將繼續受到莫內與戴高樂兩位的歐洲整合理念的影響。

歐洲整合的最大利基絕對不是可以用歐洲各國的損益表來量化的，從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五十幾年所創建的牢固和平機制，如今透過單一貨幣的整合過程，使得歐元成了不可動搖、強化永久和平的基石。

法國對歐洲整合（包括貨幣整合在內）的基本立場，可以用戴高樂的策略總結如次：法國堅持維持主權國家獨立運作的空間，歐洲整合法國採取積極領導方式，爭取德國的合作，對英國則保持距離，排除美國介入歐洲事務，特別是歐洲整合運動，對戴高樂而言，歐洲整合應該由歐洲人進行 (L'Europe européenne)，換句話說，歐洲應該是歐洲人的歐洲 (L'Europe des Européens)，反對莫內爭取美國人進行歐洲

整合的理念 (L'Europe atlantique)。戴高樂的 L'Europe européenne 或是 L'Europe des Européenne 常被盎格魯薩克遜英、美揶揄批判為法國人的歐洲 (L'Europe française 或是 L'Europe des Français)。

第六節 德國馬克為歐元的模式

第二十世紀德國經歷過兩次史上最嚴重的物價狂飆導致馬克崩盤的慘痛經驗；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後威瑪共和政權時期 (The Weimar Republic, 1919-1933)，在 1922-1923 年期間遭受到整個經濟體系的破壞，物價天文數字高漲，在當時幾乎史無前例。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再度敗戰，西德在聯軍進駐佔領初期下，馬克絲毫不值錢，當時各種物資奇缺，貨幣制度崩潰，幾乎回復到物物交換的體制。

1949 年西德恢復主權國家，新馬克制度在當時財經部長艾哈德 (Ludwig Erhard, 1897-1977) 的大肆整頓德意志國民經濟時確立，五十幾年來一直奉行著嚴謹的以壓制物價為主軸的銀根緊縮的貨幣政策。從 1990 年代歐洲開始進行『經濟暨貨幣同盟』的整合運動，就是採行德國馬克的緊縮貨幣政策的財經體系。

但是在歐洲貨幣整合過程中，德國的貨幣政策有個特色，就是『德意志中央銀行』一直抗拒德國政府財經部門的干預，終於醞釀成一個獨立自主運作的典範模式，此一典範模式最後被採納為『歐洲中央銀行體系』³⁹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ESCB ; Système Européen de Banques Centrales) 及『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的運籌規範模式。

當然在貨幣整合過程中，特別是在『馬斯垂克條約』的協商過程中，德國也無法堅持德國模式，以前幾節所舉的法國為主的『貨幣學者派』與德國主張的『經濟學者派』之爭，事實上從『Werner 報告』發表之後，一直到進行『經濟暨貨幣同盟』條款納入『馬斯垂克條約』的協商時期，依然爭論不休，但是考量到法國在蛇行浮動匯率及在『歐洲貨幣制度』(EMS) 過程中，特別是 1980 年代 Mitterrand 執政的下半期，已經接受德國的貨幣政策典範模式，尤其是在趨合基準條件做了很大的讓步，德國『經濟學者派』及法國『貨幣學者派』實際上已有共識。這對法國有長達數世紀國家干預經濟的傳統，法蘭西中央銀行幾乎從來沒享有獨立運作自主權，只是扮演執行國家經濟政策的角色，這是一大改變。而德國因為記取 1920 年代初期及 1940 年代後半慘痛的通貨膨脹經驗，德意志聯邦中央銀行誓守堅持以穩定物價，維護馬克幣值為央行操作的最高指導原則，堅拒聯邦政府的經濟干預，捍衛央行獨立運作的自主權。

在德國的主導之下的歐洲物價穩定，壓縮赤字財政的經濟政策，嚴然成了主流的貨幣整合理念。事實上，從 1985 年後，法國的中央銀行也確立了獨立自主運作的原則，歷任的法國中央銀行總裁常為此被奚落、調侃，認為法國中央銀行已經淪為德國中央銀行的「傀儡」，常被批判老是跟著德國中央銀行總裁的指揮棒起舞，但就是被揶揄「亦步亦趨」也改不了法蘭西要達成歐洲貨幣整合的決心。

1989 年柏林圍牆崩潰後，蘇俄體系也崩盤在即，面對這一急劇發生的新局勢，德國總理 Helmut Kohl 為了達成德國統一大業，乃接受法國總統 François

³⁹ 「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由「歐洲中央銀行」與各會員國的中央銀行所組成。

Mitterrand 的催促進行單一貨幣的整合，此為政治「藝術」的妥協政治。然而西德聯邦財政部長威格爾 (Waigel) 及德意志聯邦中央銀行總裁波爾 (Karl-Otto Pöhl) 對歐洲貨幣整合的第二階段，特別是設立『歐洲中央銀行』仍然持保留的態度，下意識還是受到『經濟學者派』的主張影響，認為各國的財經條件協調有成後才能進一步推動貨幣整合。Mitterrand 對西德財經部長、央行總裁的「雜音」無法忍受，乃在 1990 年 9 月法、德慕尼黑兩國高峰會 (Le sommet franco-allemand de Munich) 中表示，將撤回駐德的法軍，向西德施壓。

當然，在這種新局面的歐洲整合壓力下，德意志聯邦中央銀行當局卻不願屈於德國 Helmut Kohl 政權的壓抑，決不能犧牲得來不易的獨立自主運作的籌碼，乃轉而積極期望在『歐洲經濟共同體』體制下，展現主導或是影響『經濟暨貨幣同盟』第二階段的協商過程的策略。基本上，德國中央銀行堅持要達成單一貨幣的趨合基準條件要嚴格執行，其所提出的方案，幾乎就是後來『馬斯垂克條約』中『經濟暨貨幣同盟』條款中的五大趨合基準條件（參見本研究報告前言，pp.3-4）。

事實上，德國中央銀行與『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協商過程也不是完全無歧見的，可是基於各會員國中央銀行總裁有共同的專業理念，因此在討論『歐洲中央銀行』法規的技術層次上有共同的認知，因此容易確立各國中央銀行不受各會員國政府財經部門的干預的基本共識，確保了中央銀行總裁的獨立自主運作的原則。

經過將近一年的協商，終於在 1991 年 11 月 25 日達成協議，確立了『經濟暨貨幣同盟』的趨合基準條件以及『歐洲中央銀行』獨立運作的自主性。1991 年 12 月 5 日『馬斯垂克條約』明文規定了此一協議的結果。『歐洲聯盟條約』第 105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SCB) 之主要目標在於穩定物價。」「『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本著自由競爭與資源最有效分配的開放市場經濟之原則，並遵從（『歐洲共同體法』）第 3a 條所定之原則執行其職務。」

另外第 105 條第 2 項規定，「其基本任務為：

- 訂定並執行『歐洲共同體』的貨幣政策；
- 根據第 109 條之規定進行外匯操作；
- 持有與管理會員國之官方的外匯存底；
- 促進支付體系之順暢運作。

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 第三階段所成立的『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資本額五百億歐元，由各會員國依人員及國內生產毛額 (GDP) 比率分擔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ESCB) 在第 106 條第 3 項規定：ESCB 由管理委員會 (Governing Council)、『歐洲中央銀行』之執行委員會成員與各會員國中央銀行總裁組成之，其執行董事會 (The Executive Board)，則由總裁、副總裁、和其他四位董事組成。

結語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所建構的貨幣同盟，其範疇 (scope)、深度以及其政治經濟意涵當然不是十九世紀所經歷的貨幣同盟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有其相似的脈絡可尋，但是其差異值得深思。歐洲貨幣整合產生了歐元，歐元的誕生是否意謂著歐洲從經濟提升到貨幣的整合，將更加快速地躍入穩固的政治結盟，豁然結成一個廣大的政治實體呢？歐洲合眾國成立前的歐元與美元間的互動關係，歐洲聯盟與美國的政治暨經濟是夥伴似的關係還是既競爭又合作的特殊關係？還是因爭奪新世紀的領導權而成緊張的局勢。無疑的，新世紀的世界秩序應該是在歐元與美元相互摸索中穩定發展，因為對歐洲領袖而言，歐元是個加深歐洲整合強有力的工具，而不是以爭奪世界霸權為其目的。對美國而言，歐元的誕生是美國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現實世界中不可忽視的新景觀，在穩定國際貨幣秩序的最高指導原則下，美國也不得不謹慎處理美元與歐元間的關係。

第三表 世界三極經貿實力

	歐洲聯盟	美國	日本	其他
人口(1997)	2億9千萬人*	2億6千8百萬人	1億2千6百萬人	
國內總產值 (1996)	6.9兆美元	703兆美元	406兆美元	
失業率 (1997, %)	11.2 / 12.4 *	4.9	3.4	
財政赤字 (1997, GDP)	- 2.4 / -2.6 *	0.0	- 3.0	
世界生產量 (1995, %)	30.8	26.1	21.0	21.5
國際貿易佔有率 (1995, %)	20.4	18.3	10.3	51.0

* 歐元十一國(Euroland)

歐元是人類經濟史上劃時代的創舉，也是標誌走向歐洲政治整合的重要里程碑。二十一世紀的政經生態也將隨著歐元的誕生有所改變，歐、美、日間的三角關係是否因此有所變化，就有待進一步觀察。短期內主導世界經濟達半個多世紀的美元大概是不會受到歐元的挑戰，但是歐元持續的進展對歐洲經濟實體的鞏固與發展絕對是有益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兩三年來，美國的大企業 (Big business) 早就看好歐元的前程，早先運作配合歐元新世紀來臨的原因。

東亞與東南亞經濟傳統上都是以美元為計價與交易的單位，短時期內歐洲對東

亞、東南亞的投資或是貿易當然不會遽增，因為『歐洲聯盟』依然是以擴大到東歐為首要的政經策略，但是幾年來『歐洲聯盟』也開始試圖與東亞、東南亞對話，可是基本上歐洲人與亞洲人在企業商業文化上的交流有限，像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君臨」亞洲所帶來的頻繁交流與美援所產生的後果，歐洲人恐怕無法在二十一世紀前半葉能取代美國人或是日本人的企業科技實力，因此歐元也就無法在短期內取代美元的地位⁴⁰。但是歐元被亞洲金融機構當做記帳單位或是外匯存款的可能性及比例肯定會增加。

另外歐元的實施意味著歐洲合眾國遲早會建立，財經與貨幣的整合將是政治整合的先決條件，而今隨著歐元單一貨幣整合的建構完成，剩下來的政治與軍事的協調不再是無法橫越的阻礙。同樣的，歐洲合眾國的成立，第二十一世紀肯定不會再引發大規模的戰爭，歐洲合眾國與美利堅合眾國攜手合作，共營世界和平的體制應該是會更加鞏固。當然，有些美國學者持相反的見解，認為美、歐之間反而會引發緊張關係，美國對歐洲的防衛意願也會因而減少。這種推理是冷戰期間最慣用的看法。事實上，強大且和平的歐洲與美國取得政經的平衡對世界絕對有益無害。

對台灣而言，歐元的實施不僅對二十世紀依賴美、日市場過鉅的台灣企業有某種程度的反思空間，其實更重要的是如何與歐洲各先進國進一步的交往。

張維邦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教授

⁴⁰ 全球的貿易金額的 60% 經由美元計價 (Jean-Michel Floc'hlay, 1996, p.42)。

附錄一

(1) 整合的意涵

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國民國家或國族國家)的形成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幾乎是同步平行進展的。國家主權的擴展可以說是民族國家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在傳統貿易的擴張與境外投資盛行的結果資本(貨幣匯兌)跨國境所引發出來的經濟政治問題，不是單獨一個國家主權所能規範解決的。此外，科學技術(衛星與媒體)的突飛猛進，也使得傳統的國家主權又賦予新意義。

可以說資本的橫行環球與科技突破疆界的進展是加速國際經濟整合的兩大主要因素。當然戰爭頻仍；殺傷破壞力的強大及戰費軍備的高昂，終於迫使政治人物不得不尋求世界和平。和平的追求及憧憬無疑的也是國際政治經濟整合的原動力之一。戰後歐洲經濟整合的動機就是要解決數世紀以來德法兩國的敵對關係。因此經濟整合是和平的最佳保證。

由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是第一及第二世界大戰之間，各國採取閉關自守的保護貿易經濟政策的結果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大恐慌一發不可收拾，最後以大規模的戰爭結束經濟大蕭條。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自由貿易原則，促成史無前例的六十年代的世界經濟繁榮。然而從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一直到現在，觸發經歷過斷斷續續的週期性經濟萎縮及發展，也就是為了解決世界性的經濟萎縮，先進經濟強國積極在尋求區域乃至全球的經濟整合。這一趨勢將隨著科技的突進及流動資本的巨額累積愈來愈加速。

其實，國際經濟整合旨在解決整體的世界經濟問題。當然國家經濟主權依然盛行，美國一直運用或是晃動其強大有效的經濟制裁機制，所謂的超級301條款對台灣來說絕對不是空洞的法律條文。因此對長期台灣的利益來說，是儘速加入各種國際機構，或是積極推動國際經濟整合，以確保台灣的安全及經濟繁榮。當然在經濟整合過程中，尤其是在短期間有其代價，但是長期的，總的來說，必定利多於代價。

「經濟整合」涵蓋的層面相當廣範。它可以指一個企業被另外一個龐大的公司所收購併吞的過程或結果。在某個經濟部門，如汽車製造部或石油部門，企業兼併的結果等於該部門愈來愈集中。因此經濟集中(economic concentration)與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從產業經濟學的觀點來研究的話，可說互為表裡，或是一體的兩面。

經濟集中可分成兩種：橫向集中(horizontal concentration)及縱向集中(vertical concentration)或稱縱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橫向集中指的是，同部門、同行業間企業兼併、合併的過程或結果。如本世紀初葉，在美國大約有上百家汽車廠商，到戰後兼併、合併的結果只剩下三大一小的通用汽車公司、福特，克萊斯勒及美國汽車公司。縱向整合指的是，不同部門，不同行業但互相有關聯有互補關係之企業的兼併、合併的過程或結果。譬如，福特汽車公司為了確保鋼鐵器材的供應，兼併了或是自創鋼鐵公司。同樣的，漁業公司為確保漁業的發展，兼併或自己成立罐頭

加工廠。總之，企業兼併、合併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追求規模經濟，企業經營效益及市場支配或寡頭壟斷。

可是一提到國際經濟整合，一般都是指主權國家間從經濟合作到貿易、財稅、貨幣、金融等政策的協調過程。其目的是企望透過經濟整合達到整體的經濟繁榮：經濟持續成長，國際收支平衡，物價穩定，壓低失業率，維持社會福祉。

從靜態的角度來觀察經濟整合的話，某一區域裡的個別國家的經濟不再受疆界的區隔，而混合成為一個經濟實體。從動態的角度著眼的，經濟整合指各國試圖消除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金融等各式各類的障礙，從而逐漸地達成一個更大的經濟實體。一般而言，靜態指的是經濟整合的結果；動態則意味經濟整合的過程。

馬赫魯普 (Machlup, 1977) 為釐清「經濟整合」的複雜概念，於 1977 年發表了《經濟整合思想史》(A History of Thought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著作。他從經濟思想史切入，認為國際經濟整合理論於第二次世界戰前，尤其是國際聯盟組織的經濟學者面對各國採取閉關自守的保護貿易政策，冀想解決各國國內的經濟蕭條的困境，世界貿易因此受到極大的限制，整個歐洲大陸瀕臨經濟解體 (disintegration)，所以戰後積極倡議在重建時得進行各國的緊密經濟合作，這時「整合」(integration) 的字眼還沒有被廣泛地使用。根據 Machlup 的考證，在 1942 年以前有關關稅聯盟，國際貿易的學術文獻資料都沒有出現過「將個別不同的經濟結合在一起成為大的經濟區域」(combining separate economies into larger economic regions) 意義的「整合」項目 (Machlup, 1977: 3)。1937 年版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雖曾使用過 Industrial integration，但指的是產業經濟學或是產業組織中企業間的集中合併，並不延伸成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整合。就算十九世紀德國統一前的關稅聯盟 (German Zollverein, 1837-1871) 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際貿易理論都沒有提到區域經濟整合或是國際經濟整合。

雖然早在 1933 年 Herbert Gaedicke 與 Gert von Eynern 合著《歐洲經濟生產整合：歐洲諸國國外貿易緊密來往關係的一個考察》(Die produktionswirtschaftliche Integration Europas: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Aussenhandelsverfle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Länder) (Machlup, 1977: 7) 一書，但此整合只不過是強調貿易的緊密關係而已。戰後美國官方內部，特別是在援助歐洲經濟重建時，才頻繁地使用 integration。美國主管經濟合作行政署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的霍夫曼 (Paul Hoffmann) 於 1949 年 10 月 30 日向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的理事會致辭時呼籲進一步達成「西歐經濟整合」(Machlup, 1977: 11)。

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得獎的丁培根教授 (Jan Tinbergen) 於 1954 年出版其《國際經濟整合》(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1954) 在該書的序文中提到前一版的書名為《國際經濟合作》(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1945) (Machlup, 1977: 4)。丁培根是戰後第一位對經濟整合的概念進行有系統剖析並下定義的經濟學者。他提出負面與正面的經濟整合概念。所謂負面（或許也可稱為消極面）經濟整合 (negative integration) 就是為了經濟整合國與國著力消除各種限制性的經濟差別體制或措施，使得經濟交易能夠自由地暢通無阻。丁培根所稱的正面（或積極面）經濟整合 (positive integration) 却是指用強制力 (coercive powers) 協調各國間既存的，必要時制定新的，經濟體制及政策。

Tinbergen 的分析表面看來有點矛盾，為什麼讓經濟交易能夠自由地暢通無阻的被稱為負面經濟整合；而使用強制力協調經濟政策及措施卻稱為正面經濟整合。馬赫魯普就提到這一矛盾：為什麼自由是負面，而強制確是正面。（“Freedom is negative, coercion is positive”; Machlup, 1977: 21）。事實上要消除經濟差別體制或措施（如消除貿易限額，差別關稅，各種行政規格的貿易障礙）較容易達成協議，可是一碰到要制定共同的經濟政策就會牽涉到因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卻要採取同樣的經濟政策，以至所引發高度政治爭議性的難題。譬如有些國家有通貨膨脹的壓力，採取高利率的貨幣政策，然而也要經濟整合的其它國家卻有經濟低迷、景氣不振的棘手難題，則非採低利以刺激投資的經濟措施不可。弔詭的是，這種背道而馳的經濟策略如何協調，牽涉到的不是純粹的經濟政策而是觸及千萬人的日常生活的民生社會問題，絕不是政治人物輕易可以透過協商可以達成的。從這點看來三十幾年來歐洲的經濟整合經驗非常難能可貴。

Tinbergen 之後，鑽研國際經濟整合最深的是巴拉薩 (Balassa)。Balassa 在 1950 年代陸續地發表有關經濟整合的論文，1961 年發表《國際經濟整合》。他在該書第一頁開宗明義地認為，經濟整合是一個過程 (a process) 也是一種情勢狀況 (a state of affairs)。經濟整合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觀念，消除國與國之間的任何差別待遇 (discrimination)。經濟整合也是一個靜態的概念，意謂國與國之間已經沒有各式各樣的差別待遇存在 (absence of different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Balassa, 1961: 1)。

Balassa 將經濟整合的意涵侷限在國與國之間動態的整合。他從歐洲共同市場的演變為他研究的出發點，因此他強調各個會員國如何來達成經濟整合的過程及其結果。一個國家內部的整合不在 Balassa 的研究範圍，那是屬於國內經濟政治社會政策的範疇裡。如何透過國家財稅（如平準基金的設置）來達成地區的整合。

國與國間的經濟整合也可以先從各個經濟部門的協調進行，事實上歐洲共同市場之所以成立，就是因為有『歐洲煤鋼共同體』的積極成果。『歐洲原子能共同體』，也是屬於部門經濟整合。因此經濟整合的過程指的就是從部分整合到最高層次的整體整合 (complete integration)。經濟部門的整合 (sectoral integration) 也可以稱為部分整合 (partial integration)。

既然經濟整合涉及勞工人員，資金，產品等的自由流動，因此 Balassa 主張可以將經濟整合分成貿易整合 (trade integration)、生產要素整合 (factor integration)、政策整合 (policy integration) 及全盤整合 (total integration) 等層次來分析研究。雖然 Machlup 覺得或許用市場整合 (market integration) 來得較恰當，可是他也承認有些市場，譬如，農業市場的整合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假如任由自由市場機制發揮其功能，農業生產遲早一定受挫，到底需求及供給彈性低的農產品，從事長期的投資規劃，灌溉系統的建設，農業技術的改良等等，都不是短期豐收觸引的市場急劇變動或是農產價格低落不變這種條件下能完成的。因此農業市場的整合最富於政治討價還價的交易協調色彩。

霍茲曼 (Holzman, 1976: 59) 則將經濟整合局限在價格層次。他認為兩個地區間所有的相類似的產品，或是同樣的生產要素的價格達到等同一致的情況。這是從市場的觀點來考察，也就是兩個不同區域的市場在價格趨於一致時融合成一個市場。從產品價格與生產要素的價格等同的研究途徑來審視幅員廣大的國家，如美國，其

國內產品價格由於交通資訊四通八達，又沒有政治體制的扭曲（貪污制度化及所謂的諸侯經濟體制）下，國內經濟整合的程度較高，反之，就是同樣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境內並不保證經濟有所整合。加拿大境內的兩大鄰境省份安大略及魁北克的貨物並不是想像中那樣暢通無阻。各省政府的採購都定有限制性的條例，使得省與省間的貨物及生產因素的流通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

Holzman 的價格等同概念，意涵在兩個地區價格進行等同的過程，許多阻擋貨物產品及生產要素的障礙都已經消除，甚至兩個地區都設法設置法律行政機構來促進剔除產品價格的差異的因素。歐洲共同市場從六十年代開始的經驗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產品或是生產因素價格等同的過程非常複雜，牽涉到的範圍異常廣大，不僅是財稅，行政法規，而還觸及匯率的難題，因此價格的等同是一項艱難的大工程。Holzman 所強調的價格等同概念是整合過程中要達成的目標，經濟學者對價格等同的見解相當不一致。有的認為經濟整合後自然會取得價格一致的結果，有的卻不以為價格與經濟整合有必然的關係。與其說是經濟整合的結果，整合區域內的價格會趨於一致，倒不如說是工業化的結果國際價格會趨向同一範疇。經濟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間的價格體系當然無法相提並論。三十年前的台灣與美國的價格根本無法比擬，可是今天的台灣薪金或是物價已經接近先進國家的水平不太遠。

屏達 (Pinder, 1969: 143-45) 引述 *Oxford Dictionary* 字典來說明經濟整合的意義。牛津字典將整合解釋為「各個部分結合成爲一總體」(the combination of parts into a whole) 聯盟或是同盟是由各會員國或部分結合而成的結果 (“ Union is the outcome of the combination of parts or members”)。因此屏達認爲經濟整合是要達成聯盟的過程。將經濟整合界定爲會員國間消除各種差別措施及制定共同的政策的過程。

裴克曼斯 (Pelkmans, 1984: 3) 將經濟整合定義爲兩個或是多個經濟間的經濟境界 (economic frontier) 的剔除。也就是說，這些個別的經濟渾然化成爲一體。Pelkmans 所謂的經濟境界指的是因爲界線的存在使得產品、勞務及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相對地低落。一旦產品、勞務及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增加，那就表示經濟整合程度提高。這一定義不僅理想，流動性的低落倒不定是因爲存有經濟境界的關係，原因很多，語言，生活習慣，社會習俗，政治風險都有關。中東諸國就是一個淺顯的例子。反之，像台灣商人縱使有高風險的地域如中國大陸，他們也趨之若鶩。產品的流通，生產要素的流動，僅是低層次的經濟整合。

埃爾阿格拉 (El-Agraa, 1985: 1) 將經濟整合界說爲參與會員國間的差別貿易障礙的全部剔除，並達成建立某種協調機制的協議。既然是消除掉所有的貿易障礙，那就表示貨品、勞務及生產要素可以暢通無阻。這一界說比裴克曼斯的定義所指的經濟整合程度稍微高一點。後來 El-Agraa 更進一步地將經濟整合程度往上推進，認爲經濟整合是國與國間達成協議追求共同的目標及政策 (El-Agraa, 1988: xiii)。

羅布森 (Robson, 1987: 1) 則從空間層次 (spatial aspect) 來探討經濟整合。他雖然強調經濟資源運用的效率 (efficiency)，不過他的定義跟其他學者的定義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他將經濟整合定義爲產品、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及差別的消失。

從上述幾個定義來看，各學者對國際經濟整合所強調的層次都不盡相同。馬赫魯普說國際經濟整合最明顯的表徵就是整合中的國與國的邊界關卡消失不見了。他舉賓西發尼亞州及歐亥歐州間的通商無統計貿易數額爲例來說明經濟整合的程度。

換句話說，如果通商的結果還存有貿易額的統計數字，那表示經濟整合程度還不高 (Machlup, 1977: 24)。

到底經濟整合是要整合什麼？整合人民，市場，生產，消費，貨品，勞務，地區，生產要素，貨幣，自然資源？部分還是全部？如何來測度經濟整合的程度？到底經濟整合的本質是什麼？如何來評估經濟整合的過程？馬赫魯普認為貿易是經濟整合的主軸，勞動分工是經濟整合的基本原則。至於測量經濟整合的程度則以貨品或生產要素價格的等同為基準，當然也得考量運輸費用的差異 (Machlup, 1977: 43)。

(2) 經濟整合的鵠的

基本上，一談到經濟整合，馬上就會聯想到市場的整合。而市場則可分成商品貨物、勞務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勞動就業市場，資本市場，自然資源市場等等）。如果商品貨物，勞務無法自由流通，則談不上經濟整合。因此自由貿易是達成經濟整合的首要目標。古典派經濟學一再強調自由貿易所產生的絕對利益及比較利益。分工及專業可提高生產效率；互通有無是貿易的基本原則，規模經濟會降低生產成本。貿易的進展，長遠的說不僅促進經濟繁榮，而且更可消弭紛爭帶來和平福祉。另外整合的結果，擴大市場，也會刺激整合區域內的企業競爭；另外貿易條件 (terms of trade) 也會有所改善；當然企業競爭，資金及生產因素的自由流動也會促進科技昇級。

當然從短期來考量貿易的自由化，常因各國經濟條件的差異，會引發貿易摩擦。競爭力弱的國家在景氣不振、面對高失業率的壓力時，各國會傾向採取保護國內企業緊急措施。可是各國如果都競相採閉關的保護政策（產業政策，非關稅障礙，繁瑣的行政手續），遲早不僅會減低經濟效益，也因此會縮小市場。

畢竟經濟整合雖以長期經濟繁榮為最終鵠的，可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經常有結構性的景氣循環難題，俗話所說的好景不常來刻畫資本主義的經濟循環再恰當不過。好景不常還好，如果演變成結構性的失業率居高不下，那就嚴重。以法國為例，從八十年代初社會黨密特朗總統執政到現在一直受高失業率的困擾，尤其是最近四、五年，失業率維持在 9% 至 12% 左右。政府的財政也因舉債以應付龐大失業軍的社會保障支出而陷入收支失衡的陷阱。為了突破困境，密特朗冀望透過歐洲經濟整合來解決法國的經濟結構性難題。然而密特朗的政敵卻指控歐洲經濟整合才是真正罪魁；經濟整合一下子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循環的替罪羔羊。

1988 年加拿大跟美國協商簽訂美加自由貿易協定時，加拿大勞工界及文化工作人士強烈反對協定的簽署，他們高舉加拿大高度社會福利制度及獨特的文化會因自由貿易協定的生效而逐漸消失破壞的大纛。迄今加拿大的社會福利制度還沒遭到自由貿易協定的破壞，可是間接地在國際經濟競爭及財稅不勝負荷的壓力下，加拿大是否能確保其高度的社會福利制度已開始遭到挑戰質疑。至於加拿大刻意要保持獨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其實因鄰近美國，而在無遠弗屆的好萊塢文化媒體滲透下，就是沒有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的法律約束也無法招架，何況美加自由貿易協定並不含蓋文化產業。

當然，歷史上也有簽署經貿或關稅條約而不影響到各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的例

子。譬如說，荷蘭的福利制度遠較比利時的還發達且也更昂貴，但兩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卻沒有影響到各自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然而這個例子應用來證明美加兩國將來的社會福利發展並不恰當，原因是加拿大與美國的經濟實力相差太懸殊，一對十，而荷蘭及比利時都是雋小袖珍型經濟，沒有君臨壓境的實際問題。

在經濟整合過程中，從關稅聯盟進入共同市場整合，或是從共同市場昇入經濟聯盟的整合層次，各國得面對財稅的調整壓力，否則低稅率的國家會佔盡經濟整合的便宜，因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貨物、勞務及生產要素的流動都會走向低稅的國家。因此在經濟整合過程中非進行財稅等協調等整合不可。

(3) 經濟整合的層次

Balassa 在其廣為引用的著作《經濟整合理論》整理出五種層次高低不同的經濟整合模式。其實巴拉薩忘了將達成自由貿易區以前，國際貿易理論及實務都常提到的優惠貿易區 (preferential trading area)，這是經濟整合的最低層次。優惠貿易區僅同意兩國間降低關稅（不是消除全部的關稅），但對第三國則不給關稅優惠。

一、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顧名思義自由貿易區指的是，區域內的國家同意消除關稅及限額的措施，以利貿易。然而每一個簽署國對第三國的關稅及其他貿易規範，則隨意自主，不受自由貿易條約的拘束。

二、關稅同盟 (Customs union)

指的是，同盟區域內國家不但去除關稅及限額條例，而對第三國也採取共同一致的關稅稅率。各關稅同盟國以單一實體採取劃一步調參與國際貿易及關稅的協商。

三、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

除了跟關稅同盟一樣外，共同市場內的產品貨物、勞務及生產要素（包括資金、勞動力）自由流動，但對第三國生產要素的流動則採一致的規範或限制。

四、經濟聯盟 (Economic union)

不僅各會員國同屬一個共同市場，也進行財政、貨幣、工業、地方區域、運輸或其他經濟政策的調合運作 (harmonization)。也就是說，將各會員國的經濟政策差異性減到最低。既然屬於同一共同市場，貨物商品、勞務、資金、勞動力等能自由移動，貿易的往來自然會涉及金融匯兌手續的層次，如果匯率無法固定，或是貨幣無法統一的話，會經常遭遇到金融風暴的襲擊，因而甚至會影響到經濟整合的順遂。

五、完整經濟聯盟 (Total/Complete/Full economic union)

各國經濟渾然成為單一的經濟實體。由超國家的政府統籌實行單一的經濟政策，換言之，各國已無實質上經濟政策的差別性。

從上述五種程度不同的經濟整合模式來思考的話，好像經濟整合是透過各國政府的協商才達成的，事實上不盡然，市場的整合其實不經過各國政府的介入，早已由跨國公司、銀行、金融等企業機構默默在進行中。但這種非正式的市場整合遲早會碰到發展的瓶頸難題，最後還是要各國政府當局的協商達成法定的整合。而簽署條約後的整合也會進而加速跨國公司、銀行、金融等企業機構的市場整合。這樣相

互的辯證運作，其實正是晚近兩百多年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質而言之，資本自十六、七世紀的累積，而今在全球經濟整合中幾乎不受各國疆土的拘束。資訊交通運輸工具的日益發達，及龐大的資本累積，企業資金再也不欠缺匱乏。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因為資金的氾濫衝破了國土疆界的侷限。

雖然經濟整合表面上看來是經濟層面的活動，然而睽之實際確實政治層面的決定。事實上一個國家決定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加入關稅聯盟，共同市場到積極昇級建立經濟聯盟就是表示放棄有關關稅，限額的國家主權，甚至為達成經濟政策的協調一致，各會員國不得不放棄更大部分的傳統國家主權。但這並不意謂國家主權已經過時，目前 *nation-state* 或是 *Etatisme*（國家主義）並沒有消逝，而只不過是從一個傳統的國家主權升高到一個規模更大的經濟聯盟或是較鬆懈的邦聯及較嚴謹的聯邦國家主權的形式而已；目前的歐洲聯盟各會員國還沒有放棄全部的國家主權，但有朝一日，從經濟整合達成政治整合時，國家主權會提昇到歐洲聯邦合眾國的層次。

附錄二

(1) 何謂貨幣同盟 (Monetary Union)

Monetary Union 中文除了可將之翻譯成貨幣同盟外，有時也可譯成貨幣聯盟。顧名思義，貨幣同盟是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各自擁有獨自發行的貨幣決定結成貨幣的同盟。1933 年 Axel Nielsen 將之定義為，「兩個或是兩個以上的國家達成協議採用某種共同規範各自發行的貨幣的樣式」。如何規範管理不同的貨幣，或是不同的融合成一體？這是問題的重心。各國各自發行不同的貨幣，其相互間的匯率又是如何訂定，固定不變的？在十九世紀的貨幣同盟國家所達成的協議，主要是規範不同的貨幣可以在他國，特別是邊界地區可自由流通使用。

Nielsen 將貨幣同盟劃分成三種類：(1) 汇率固定的不同鑄幣可在貨幣同盟的會員國中自由流通；(2) 會員國採用同一的貨幣；(3) 會員國除了自行發行的貨幣外，也使用平行的貨幣 (a kind of parallel currency)。除了承認其他會員國的平行貨幣也是法定貨幣外，所謂的平行貨幣到底與本國貨幣幣值間到底如何界定？通常都是以固定匯率處理。所謂的平行貨幣，其實是兩國間部份的貨幣在兩國流通，並不是所有兩國的貨幣全面在兩國平行流通。

質而言之，十九世紀所經驗過的貨幣同盟主要有兩種類：

1. 區域間（或是超越本區域）的貨幣同盟：此類貨幣同盟主要肇因於政治上的統一，如 1848 年的瑞士，1861 年的義大利以及 1871 年俾斯麥統一德意志。此類貨幣同盟的特點是將各區域的鑄幣發行標準化：記帳單位統一，貨幣可自由流通於各同盟的區域內，成了還債的或是購買物品的支付手段。

2. 歐洲各國間的貨幣同盟：主權獨立的國家簽署合約規定相互間的匯率。當任何一方的國家宣佈停止受條款的約束時，同盟就結束。歷史上有名的 1857 年德奧的貨幣同盟，1865 年拉丁美洲的貨幣同盟以及 1872 年的斯堪地那維亞貨幣同盟，都是好例子。後兩者貨幣同盟國家間施行固定匯率，而且固定的方式很簡單：以一對一的匯率施行貨幣的流通，記帳單位也統一，在斯堪地那維亞使用「克羅能」(Kronen)，在拉丁美洲則用「法郎」(Franc)。德奧的貨幣同盟的形式採用平行貨幣，換言之，部份的鑄幣通行於德奧兩國，而不是用同樣的鑄幣流通。

十九世紀銀行發行貨幣（紙幣）與今日各國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功能不盡相似。當年的銀行跟今日的商業銀行一樣是以貸款賺錢為目的。

(2) 十九世紀貨幣同盟的經驗

中世紀晚期及近世交接的兩三個世紀在歐陸展開文藝復興（十四、十五及十六世紀）的同時期，發生了宗教改革運動，科技的發展掀開了海洋大探險的序幕，歐洲優越的航海技術終於將歐洲與美洲及亞洲拉近，同樣的，在現今義大利臨地中海地帶也萌芽了現今還在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也興起了國族

國家 (Nation-State)⁴¹ 的政治體制一直到今日，雖然資金不受疆界的影響而暢通無阻，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主權將為之消失。隨著 Nation-State 的演進，以國家主導經濟體系的重商體制，漸漸因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後半的英國發生了，自此而後，工業化促進了英國體制全盤現代化，為了擴展國際市場，英國古典派經濟學家在 Adam Smith 及 David Ricardo 構築自由貿易理論下，經濟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的思想終於孕育發展起來。

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是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經濟整合過程中，最後也是最高階段的整合層次。要瞭解歐洲整合的實踐過程，以及十九世紀貨幣同盟的經驗，那就非從歐洲一統 (Unity) 的理念去探索不可。昔日的理念或是烏托邦 (Utopia)，渺不可及的理想，而今都已經成了事實。倡導並嘗試實踐泛歐洲 (Pan-Europe) 理念的 Richard N. Coudenhove-Kalergi (1894-1972) 在 1920 年代曾說過，每一個偉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其源頭都是起自烏托邦的理念，最後理念付之實踐，成了事實 (Vanthoor, 1997, p. vii)。歐洲整合及貨幣整合進行伊始，也是以烏托邦式的理念出現，經過漫長的演變，而今終在二十世紀末體現了！

值得一提的是，兩千多年來的歐洲歷史沿著三個主軸漸次發展：古希臘文明與文化(哲學)、羅馬的體制(法律)及猶太基督(宗教)傳統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雖然透過文明的手段進行和平整合前的歐洲，統治者都以武力試圖統一歐洲，結果都不得而逞：古羅馬凱撒大帝 (Caesar, Gaius Julius, 100-44 BC) 雖然風光一時，侵佔了西北歐，征服了英倫三島，但帝業卻後繼無力，終於崩潰；其後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 (Hapsburg) 王朝的帝王，特別是查理五世⁴² (Charles V, 1500-1558) 也都企圖以武力要征服歐陸，最後還是失敗；稱帝後的拿破崙 (Napoléon I, 1769-1821) 也橫掃歐陸，遠征到俄羅斯，結果最後也慘遭滑鐵盧，鬱鬱而終於地中海的聖海倫島；二十世紀的希特勒 (Adolf Hitler, 1889-1945) 及慕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更加瘋狂，席捲全歐，也終於敗亡。武力征服試圖統一歐洲版圖終究是短暫的，所付出的代價當然也是慘痛的。

歐洲大一統的構思，從中世紀以來就相繼有哲人展開歐洲烏托邦的建構，其中最讓人矚目的就是聖比厄爾修道院院長卡司德爾 (Charles Iréré Castel, Abbé de Saint-Pierre)，他在 1712 年曾撰寫到《使得基督君王之間能永久和平的條約方案》，

⁴¹ 通常 Nation-State 都譯成民族國家，日本人則將之翻成國民國家，Nation 指的是一國之內的人民，有著共同的命運連帶感，民族較有血緣的涵意在內，國族則可能是眾多血緣不同，但有共同的歷史連帶感，法國就是一個好例子。雖然歐洲整合，但是 Nation-State 並沒有消亡的跡象，歐洲聯盟走向歐洲合眾國的過程，雖然沖淡了歐盟會員國各自的 Nation-State 體制的色彩，然而將來形成的歐洲合眾國恐怕還是會維持 Nation-State 的形式發展。

⁴² Charles V (1500-1558) 是西班牙菲立普一世 (Philip I of Castile) 之子，六歲成了屬於當今法國的 Franche-Comté 及荷蘭 (the Netherlands，包含一大部分今日的比利時) 土地的國王 (1506-1555)，當然他也是西班牙的國王 (稱為查理一世 Charles I, 1516-1556)。十九歲登基成為哈布斯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1519-1557)，即查理五世。神聖羅馬帝國龐大無比的軍事力量終究無法固守疆土，與法國 (1521)、義大利 (1526) 及英國 (1529) 發生戰事。他取締路德教派的信仰，雖然後來會採取較溫和的態度對待基督教新教 (Protestants)，但終究無法處理宗教信仰的難題，1552 年德國 Saxony 的國王 Maurice 及法國的亨利二世 (Henri II) 聯軍攻擊查理五世。1555 簽署 Augsburg 條約。最後將奧地利王國給了他的弟弟 Ferdinand I，1556 年退位，將西班牙王位讓其子菲立普二世 (Philip II, 1527-1598)。1557 年遁入修道院。翌年 1558 年逝世。

或是使得歐洲永久和平的條約方案》(Projet de traité pour rendre la paix perpétuelle entre les souverains chrétiens, ou projet de traité pour la paix perpétuelle en Europe)。此一構思當然與歐陸君王為擴張版圖，相互頻繁廝殺，使得民不聊生，息息相關。聖比厄爾修道院院長倡議成立歐洲參議會，這一歐陸諸國的聯盟由各國派代表加入。成立一個集體的軍隊，其費用支出由各會員國分攤，一有破壞聯盟行徑，聯合軍隊出軍制裁之。此一理想無法付諸實現，各國依然訴諸傳統的方式擴張版圖。原因當然是受到各國傳統主權的觀念影響，歐洲固然有相同的歷史背景（即上述的三大主軸：希臘文明與文化、羅馬法制及猶太基督傳統，然而各國君王囿於天主教（即所謂的舊教）及基督新教（路德教派，卡爾文教派等）信仰的差異，而後特別是十九世紀後半及二十世紀前半葉，各國統治者因意識形態作祟（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挑起大戰。當然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不均也是動亂的原因，弱肉強食，希特勒之想稱霸歐洲除了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法、德軍事經濟實力及政治體制懸殊（法國企業的衰弱，第三共和無法面對二十世紀經濟的挑戰）的不對等。

歐陸十八世紀末葉英德哲學家，如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及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憧憬和平，思考統一的歐洲。另一個德國的哲學家 Karl Krause 於 1814 年出版了歐洲諸國聯計畫 (A Plan for a European League of Nations)，他倡議歐洲人民自願地依階段結合成一個聯邦體制的國家。1814 年法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哲學家聖西門 (Claude-Henri, Comte de Saint Simon, 1760-1825) 也出版了一部《有關歐洲社會的重新建組的論著》(Mémoires sur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主張英、法兩國組成一個自由的歐洲聯邦。1850 年代聖西門的聯邦理念也影響不少歐洲思想家，其中義大利的 Carlo Cattaneo 就寫過，「當我們建立了歐洲合眾國時，我們就有了和平」(Duroselle, 1957)。

法國十九世紀詩人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在 1849 年 8 月和平會議時倡言歐洲的統一。義大利的革命志士馬志尼 (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 更加激進，提議推翻反動的王室建構一個統一的歐洲 (Anton Zottman, 1963)。

事實上，十九世紀固然有統一歐洲的訴求與理念，但整個時代的主流景觀還是停留在 Nation-State 的框框。義大利及德國的軍事行動目標是將小王國統一起來建構成一個強大的 Nation-State。而反映在經濟發展與企業的競爭力無非是貨幣體制的健全與否，事實上貨幣體制與個體企業、總體經濟無從分割。國家的主權體現在貨幣獨立自主的發行，但是歐洲各國有些地區的人民混合使用不同的貨幣，強勢的貨幣當然流通範圍較廣，就像二十世紀後半的美元為全球各地所使用。二十一世紀的兩大世界性貨幣美元及歐元如何相互運作，有待觀察。肯定的是，日圓無法成為世界性的通貨，因為其經濟實體無法與歐美相提並論，可是這並不意味日圓不能維持成一個強勢的通貨，完全取決於今後的經濟科技實力。

歷史上有名的拜占廷帝國 (Byzantine Empire, 395-1453) 時代的金幣 solidus，被稱為中世紀的通貨。第一位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卡絡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742-814) 其使用的卡絡林鎊 (Carolingian pound) 當然在其帝國版圖通行無阻，是個道地的通貨。其他像法國的 Ecu d'or，荷蘭十七世紀以降的 Lion daalder，奧地利的 Maria Theresia Thaler 以及西班牙的 Real 等所發行的貨幣都流行

daalder，奧地利的 Maria Theresia Thaler 以及西班牙的 Real 等所發行的貨幣都流行甚廣，超過發行的本土。這些通貨之無法盛行到今日（成了收藏家的對象）是因為這些發行國家的經濟實力衰弱（通貨膨脹或是劣幣逐良幣）的結果，當然漸次消失於流通市場上。除了歐元外，歐洲兩千多年的通貨史，嚴格的說，並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貨幣整合的歷史經驗。

1993 年馬斯垂克條約有關貨幣整合的運作，標誌著劃時代的創舉。歷史上不用炮戰武器進行政治經濟整合，以達到大一統的歐洲，二十世紀後半是個彌足珍貴的歷史經驗。從單一市場到單一貨幣，不受經濟發展程度參差不齊及語言、文化、習俗差異性的制約，歐洲兩代政治經濟菁英從對話到合作，展現了無比高智慧的領導能力。

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貨幣同盟的歷史背景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進行的貨幣整合的經驗當然不一樣。十九世紀後半葉正是德國 Nation-State 發展的高漲時期，從 German Nation 尋求 German State 的過程，其實就是以貨幣關稅統一的形式出現，鐵血宰相俾斯麥 (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1815-1898) 擴大版圖的結果，統一了德國，成了帝國 (Reich)。

金本位制度、銀本位（金屬貨幣）制度與貨幣同盟的時代意義何在？十九世紀的貨幣同盟是以何種形式出現？是政治統一過程中的貨幣同盟（多個有自主性的政治實體結合成一個國家）呢，抑或是各自維持獨立自主的國家進行成為一個貨幣同盟？

十九世紀的貨幣同盟經驗顯示：唯有政治的統一，才能維持貨幣同盟，換句話說，獨立自主的國家結合的貨幣同盟無法存續，遲早同盟會解體。貨幣同盟除非是結合成一個政治實體，否則的話，因為經濟發展或是政治條件的差異，會導致貨幣間的繩緊關係，從而同盟無法持續下去。

十九世紀貨幣體系主要都是以貴重金屬（金與銀）為本位，其基本單位是依標準鑄幣為法定貨幣，發行量不受限制（有多少金塊就可鑄造多少金幣）。一般而言，有單一金屬本位 (monometallism)，如金本位或是銀本位，及複式金屬本位 (double metallic standard 或 bimetallism)，通常以金銀複本位形式出現，但金與銀間的「匯價」則由法律規範之。歷史上十九世紀前大多數歐洲都使用銀本位。但習慣上英國早已於十八世紀初葉就開始使用金為貨幣標準單位，1816 年立法通過，正式採用金本位。

法國則使用金銀本位，但 1803 年的鑄幣法並沒有明文規定為金銀複本位。金銀複本位在實際運作上有其困難，日本明治維新初期，就是吃過歐美的大虧，因為金及銀本身有其內在的價值（當做金屬使用），但是如果國家所規定的價格（特別是有關金與銀間的法定價格）固定，然而金屬市價變動時，自然會引起混亂。明治維新的新政府與歐美進行經貿關係的經驗不足，因為日本的金與銀之間的比價與歐美的比價不同，因此在短短的幾年，日本的銀圓遠比歐美的銀價還高，所以歐美貿易商用銀換取日本的金圓，在金圓消失殆盡後，日本政府被迫放棄金銀複本位。

事實上，歐陸的金銀複本位，也是由於金與銀的金屬價格的波動，與法定的金銀比價不同時，就會發生 Gresham 法則（劣幣逐良幣）的現象，價格高的貨幣被拿來作為收藏之用（良幣消失了），在市場上流通的就是低價值的貨幣（劣幣充斥市

從十九世紀初 (1800) 一般是以一公克 (kilogramme) 的黃金等於 15.5 公克的銀爲比價，此一比價與金屬的比價在十九世紀長達 70 年間變動的幅度還算不大，1800 年至 1820 年間則稍有變動，但是幅度在一公克的金等於 15 或 16 公克之間浮動，1820 年至 1850 年間，則維持在 1 比 16 公克左右（約低於 16），之後 1850 年到 1870 年則穩定在法定的價格 15.5 公克之譜，1870 年後，則銀價大貶，從比價的 1 公克金到 18 攀升到 19 公克以上。

附錄三

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幾個里程碑）

1944 年	布雷敦森林協定 (Bretton Woods)，以『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為第二次世界戰後國際通貨運作的機制重點，美元可自由兌換成黃金，以保證世界貨幣秩序。
1950 年	創立『歐洲支付同盟』(Union européenne des paiements) 以確保歐洲各國貨幣的匯兌。
1958 年	『歐洲貨幣協定』(Accord monétaire européen) 生效。達成的協定可以使各國的貨幣全部或部份相互兌換。
1962 年	『歐洲執行委員會』發表以長期著眼創立一個歐洲通貨的建議。
1964 年	創立『歐洲中央銀行總裁委員會』，以備某會員國在改變匯率前給予諮詢。
1969 年	2 月『歐洲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Raymond Barre，後擔任第五共和總統 Valéry Giscard-d'Estaing 的內閣總理，提出『經濟暨貨幣同盟』的報告。
1969 年	12 月六個『歐洲經濟共同體』創始國宣佈『經濟暨貨幣同盟』為歐洲整合的正式目標，並正式由 Pierre Werner 主持一個由資深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研究如何在 1980 年前施行『經濟暨貨幣同盟』提出相關的報告。
1970 年	10 月 Werner 報告出爐，建議在十年內，當各貨幣之間的匯率差異降低、資金全部自由化及貨幣比價無可變動後，創立一個『歐洲單一貨幣』(monnaie européenne unique)。
1971 年	3 月六個創始國同意在十年內分成兩個階段完成貨幣同盟。可惜因為美國決定讓美元自由浮動而貨幣同盟計畫終於功敗垂成。
1972 年	4 月實施在 Bretton Woods 協定架構下，規定六個創始國的貨幣匯率在上下 2.25% 限內浮動，即通稱的歐洲蛇洞內匯率浮動的機制。
1977 年	10 月『歐洲執行委員會』Roy Jenkins 主席主張各會員國在戮力達成貨幣穩定之餘採取新的方法完成『經濟暨貨幣的同盟』。
1978 年	4 月法、德兩國在布雷門 (Bremen) 『歐洲高峰會議』再度呼籲進行歐洲貨幣合作，成立『歐洲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 / Système monétaire européen, SME) 以取代匯率在蛇洞浮動的機制。
1979 年	3 月施行『歐洲貨幣制度』，創立『歐洲通貨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簡寫為 ECU，法國古貨幣 Écu 正好與 ECU 同樣的拼音)。ECU 是一個由共同體的貨幣組成的通貨籃的貨幣單位，取代『歐洲記帳單位』(Unité de compte européenne)。英鎊不加入『歐洲貨幣制度』的匯率機制。
1988 年	6 月在漢堡 (Hanover) 舉行的『歐洲高峰會議』創立一個由『歐洲執行

	委員會』 Jacques Delors 主席主持的『經濟暨貨幣同盟研究委員會』 (Comité pour l'étude de l'Union économique et monétaire)。各會員國中央銀行總裁也列席該研究委員會。
1989 年	4 月 Delors 研究委員會主張進行較緊密的經濟暨貨幣的協調，創建單一貨幣、成立一個歐洲中央銀行，並以三階段邁向『經濟暨貨幣同盟』 (EMU)。
1989 年	6 月馬德里 (Madrid) 『歐洲高峰會議』決議從 1990 年 7 月 1 日開始『經濟暨貨幣同盟』的第一階段，與此同時資金流動完全自由化。
1989 年	12 月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歐洲高峰會議』召開第一次歐盟『政府間會議』(Conférence intergouvernementale, CIG) 以便修改條約，邁向建立『經濟暨貨幣同盟』，並深入探討歐洲政治議題。
1990 年	7 月 1 日開始進行『經濟暨貨幣同盟』第一階段。
1991 年	12 月馬斯垂克 (Maastricht) 『歐洲高峰會議』通過『歐洲聯盟條約』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即『馬斯垂克條約』。英國卻不加入 (即 opting out) 『經濟暨貨幣同盟』第三階段，以緩衝方式在 1999 年 1 月 1 日不加入單一貨幣。
1993 年	上次丹麥公投反對『歐洲聯盟條約』，在 5 月再次公投通過，但與英國一樣不加入『經濟暨貨幣同盟』第三階段。
1994 年	1 月開始『經濟暨貨幣同盟』第二階段。成立『歐洲貨幣機構』(Institut monétaire européen) (即歐洲中央銀行的前身)，並建構鼓勵遵守趨合基準條件的程序機制。
1995 年	5 月『歐洲執行委員會』發表詳細進入單一貨幣過程三階段的綠皮書所揭櫫的步驟。
1995 年	6 月坎城 (Cannes) 『歐洲高峰會議』再次決議依進入單一貨幣的三階段，並要求『歐洲執行委員會』及『歐洲貨幣機構』確定綠皮書所揭櫫的步驟。
1995 年	12 月馬德里 (Madrid) 『歐洲高峰會議』決議稱新的單一貨幣單位為 Euro (歐元) 並採納至遲在 2002 年 1 月 1 日引入歐元新紙幣及鑄幣貨幣整合三階段的過渡時期步驟。
1996 年	12 月都布林 (Dublin) 『歐洲高峰會議』主要研議穩定貨幣的公約，歐元的法定地位。
1997 年	6 月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歐洲高峰會議』，簽署阿姆斯特丹條約，修正以前的歐洲整合有關條款。
1997 年	12 月盧森堡 (Luxembourg) 『歐洲高峰會議』，成立『歐元審議會』 (Conseil de l'Euro)。確立有關就業的指導方針。推進『歐洲聯盟』擴大運作。
1999 年	歐元於 1 月 1 日正式誕生。
2000 年	歐元於 1999 年 1 月 1 日創建當時約等於 \$ 1.07，然而 2000 年 8 月 1 日，歐元與美元匯價卻只剩下 \$0.9205，4 月底 \$ 0.8888，10 月中旬 \$ 0.8555。

BI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國際清算銀行
BLEU	Belgo-Luxembourg Economic Union	比利時盧森堡經濟同盟
EBR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歐洲重建暨開發銀行
EC	European Community	歐洲經濟共同體
ECB	European Central Bank	歐洲中央銀行
EC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歐洲經濟委員會
ECSC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歐洲煤鋼共同體
ECU	European Currency Unit	歐洲貨幣單位
EDC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歐洲防衛共同體
EEA	European Economic Area	歐洲經濟區域
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歐洲經濟共同體
EFTA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歐洲自由貿易協會
EMA	European Monetary Agreement	歐洲貨幣協定
EMCF	European Monetary Cooperation Fund	歐洲貨幣合作基金
EMF	European Monetary Fund	歐洲貨幣基金
EMI	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	歐洲貨幣機構
EMS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歐洲貨幣制度
EMU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歐洲貨幣同盟
EPU	European Political Union	歐洲政治聯盟
ERM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匯率機制
ESCB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歐洲中央銀行制度
EU	European Union	歐洲聯盟
EUA	European Unit of Amount	歐洲單位額
Euratom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國內生產毛額
IGC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政府間會議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
LMI	Luxembourg Monetary Institute	盧森堡貨幣機構
LMU	Latin Monetary Union	拉丁貨幣同盟
MCA	Monetary Compensatory Amount	貨幣補償額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EC	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SDR	Special Drawing Right	特別提款權
WEU	Western European Union	西方歐洲聯盟

參考書目 References

- Alietta, Michel (1998)
La Monnaie souveraine, Odile Jacob, 1998
- Auverny-Bennetot, Philippe (1998)
L'Euro, Paris, Armand Colin, Synthèse, 1998
- Bainbridge, Timonthy with Anthony Teasdale (1995)
The Penguin Companion to European Union, London, Penguin
- Balassa, Bela (196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 Braudel, Fernand (1985)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Paris, Flammarion
- Bréhon, Nicolas-Jean (1998)
Le Budget de l'Europe, Paris, LDGJ
- Cecchini, Paolo (1988)
The European Challenge 1992 (Cecchini Report: The Cost of Non-Europe).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 Cohn-Bendit, Daniel et Olivier Duhamel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Thierry Vissol) (1998)
Petit dictionnaire de l'euro,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 Crane, George and Abla Amawi (edited by) (1997)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dson, Ian D. (edited by Christopher Taylor) (1996)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The Kingsdown Enquiry. The Plain Man's Guid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de Boissieu, Christian
Monnaie et économie, Chroniques de politique monétaire Etats-Unis-France, Paris,
Economica
- Duroselle, Jean-Baptiste (1957)
'Europe as a Historical Concept', in C. Grove Haines (ed.), *European Integr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7, pp.11-20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1992)

Europe Documents, No. 1791, 8 July 1992.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 Public Debate between Economists about EMU, pp.1-4

El-Agraa, Ali (1985)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Philip Allan, ed., The Economic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p. 1-8. Oxford.

El-Agraa, Ali (1988)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European Commission (1997)

Talking About the Euro,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Commission (1997)

Euro 1999: 25 March 1998,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Feldstein, Martin (1992)

Europe's Monetary Union: The Case against EMU, in: Economist, 13 June 1992

Floc'hlay, Jean-Michel (1996)

La monnaie unique. Pourquoi? Quand? Comment?, Lagny-sur-marne, Eudyssée éditions

Fourastié, Jean (19)

Les trente glorieuses,

Friedman, Milton (1996)

Un entêtement suicidaire. Entretien exclusif avec Milton Friedman, in: Géopolitique, Printemps 1996, No.53, pp.58-66

Gaynor, K. B. and Elias Karakitsos (1997)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a Multispeed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 Guardian

Economists Attack 'Soft' Criteria, June 12, 1992, p.12

Holmes, Martin (editor) (1996)

The Eurosceptical Read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Holzman, F. (1976)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Commun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fay, Gérard (1997)
 L'Euro contre l'Europe, Arlea, 1997
- Leander, Anna and Stefano Guzzini (1997)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ocial Contracts, in: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dited by Petri Minkkinen and Heikki
- Lelart, Michel (1994)
 La construction monétaire européenne, Paris, Dunod
- Machlup, Fritz (1977)
 A History of Thought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rti, Serge et Vanessa Ragot (1998)
 L'Euro en poch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Minkkinen, Petri and Heikki Patomäki (Editors) (1997)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Boston and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 Nielsen, A.
 'Monetary Unions', in E.R.A. Seligman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X, 1933, pp.595-601
- Le Monde (1999)
 L'an 1 de l'Euro, Dossiers & Documents, Numéro de janvier 1999
- Moussis, Nicholas (1997)
 Handbook of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Brussels, European Study Service, 4th Revised Edition
- Pelkmans, J. (1984)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Pinder, John (1969)
 "Problem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G.Denton, e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urope, pp.143-70. London: Weidenfield and Nicolson.
- Robson, Peter (1987)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Rosa, Jean-Jacques (1998)
L'erreur européenne, Paris, Grasset
- Smith, David (1997)
Eurofutures: Five Scenari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Oxford, UK.
- Tinbergen, J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1954
- Vanthoor, Wim Frans Victor (1997)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Since 1848: A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 Brookfield, US, 1997 (Rev. translation of: Europese moneaire eenwording in historisch perspectief)
- Zottman, Anton
'Europäische Unionsbewegungen',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II,
Stuttgart, 1963, pp. 399-404
- 張維邦
莫內與『舒曼計畫』
in: 中山學術論叢, 第十六期, 台北, 1998, pp.19-53

